

全球對話

GLOBAL DIALOGUE

7.1

一年出版4期，以17種語言刊出

後革命的埃及

Mona Abaza

質問實在

Luc Boltanski

南非的卓越機構

Sarah Mosoetsa

非裔美國女性的代表

Patricia Hill Collins

新加坡社會學

Vineeta Sinha,
Noorman Abdullah,
Youyenn Teo,
Francis Khék Gee Lim,
Daniel P.S. Goh

波蘭的墮胎政治

Agnieszka Graff,
• Elzbieta Korolczuk,
Julia Kubisa

特輯

- > ISA青年社會學家網絡
- > 翻譯《全球對話》成印尼文
- > 介紹印尼編輯團隊

MAGAZIN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isa

第7卷 / 第1期 / 2017.1

<http://isa-global-dialogue.net/>

GD



> 主編的話

接下來呢？

所有複雜的調查研究都沒能預測到川普的當選，這顯示了美國社會學家對自己的國家所知甚少。雖然我們有人研究右翼運動—例如 6.3 期刊登的 Arlie Hochschild 的文章—但是對於左翼運動的研究遠多過於此。社會學家和其他人無異，也是物以類聚，多數研究反歧視、反不平等、反仇外的運動，但是若要了解其他不同的人，不是去犧牲我們的價值和信念，以不是去假裝我們沒有任何價值，而是要去更了解。這也必須讓我們完全進到另外一個社群之中才得以可能。這個的重要性可在這一期和上一期的文章，關於反墮胎政治的研究中可以清楚看到。Agnieszka Graff 和 El bieta Korolczuk 研究波蘭的反墮胎政治以及和反全球化的連結。Julia Kubisa 描述了波蘭的反政府的街頭雨傘抗議。Mona Abaza 則是分析了埃及的 2011 年革命之後的由賽西將軍領導的反革命。

這期也刊登了著名法國社會學家 Luc Boltanski 的訪談。他摘要了何謂研究批判的社會學，說明批判源自於制度實在和生活世界之間的落差。衝突和斷裂越演越烈，這是由於民族國家的制度和全球化的世界之間的緊張關係而導致。這也是新加坡社會學家這期文章的主題。他們研究新加坡和新加坡的社會學軌跡，聚焦在前總理李光耀過世之後的變化。文章強調了統治意識形態和生活世界的真實樣貌之間的差異，包括了社會流動、族群、宗教、政治等議題。

從亞洲我們轉向非洲，特別是南非。過去兩年來，大學一直是政治場域的鬥爭焦點。這期我們介紹了南非政府所設立的一個卓越機構，這是由社會學家 Sarah Mosoetsa 所領導的，主要支持人文社科的博士生、會議、圖書出版等。

我們也刊登了科索沃年輕社會學家 Labinot Kunushevci 對於女性主義非裔美國社會學家 Patricia Hill Collins 的訪談。另外還介紹了印尼的《全球對話》翻譯團隊。還有介紹了 Oleg Komlik 所帶領的 ISA 青年社會學家網絡。這是 ISA 的重要計畫，目的是要支持下個世代的社會學家去成長茁壯。



Mona Abaza 是埃及頂尖的社會學家，著述包括伊斯蘭、城市生活，這期探討後埃及革命的軍事化。



Luc Boltanski 是傑出的法國社會學理論家，這期討論偵探小說和對社會學的重要性。



Sarah Mosoetsa 是具起發性的南非社會學家，這期描述其運作的人文社科機構。



Patricia Hill Collins 是頂尖的非裔美國女性主義者，這期談論其知識和根源和邊緣化。



Global Dialogue 由 SAGE 出版社提供贊助。

全球對話以 17 種語言刊出，請至 [ISA website](http://isa-website.org)。

投稿請寄給 burawoy@berkeley.edu

> 編輯團隊

主編：
Michael Burawoy.
副主編：
Gay Seidman.
執行主編：
Lola Busuttil, August Bagà.

編輯顧問
Margaret Abraham, Markus Schulz, Sari Hanafi, Vineeta Sinha, Benjamín Tejerina, Rosemary Barbaret, Izabela Barlinska, Dilek Cindoğlu, Filomin Gutierrez, John Holmwood, Guillermina Jasso, Kalpana Kannabiran, Marina Kurkchian, Simon Mapadimeng, Abdul-mumin Sa'ad, Ayse Saktanber, Celi Scalón, Sawako Shirahase, Grazyna Skapska, Evangelia Tastsoglou, Chin-Chun Yi, Elena Zdravomyslova.

區域編輯
阿拉伯：
Sari Hanafi, Mounir Saidani.

阿根廷：
Juan Ignacio Piovani, Pilar Pi Puig, Martín Urtasun.

孟加拉：
Habibul Haque Khondker, Hasan Mahmud, Juwel Rana, US Rokeya Akhter, Toufika Sultana, Asif Bin Ali, Khairun Nahar, Eashrat Jahan Eyemooon, Kazi Fadia Esha, Helal Uddin, Muhaimin Chowdhury.

巴西：
Gustavo Taniguti, Andreza Galli, Ângelo Martins Júnior, Lucas Amaral, Benno Alves, Julio Davies.

印度：
Ishwar Modi, Rashmi Jain, Jyoti Sidana, Pragya Sharma, Nidhi Bansal, Pankaj Bhatnagar.

印尼：
Kamanto Sunarto, Hari Nugroho, Lucia Ratih Kusumadewi, Fina Itriyati, Indera Ratna Irawati Pattinasarany, Benedictus Hari Julawan, Mohamad Shohibuddin, Dominggus Elcid Li, Antonius Ario Seto Hardjana.

伊朗：
Reyhaneh Javadi, Abdolkarim Bastani, Niayesh Dolati, Marjan Namazi, Vahid Lenjanzade.

日本：
Satomi Yamamoto, Fuma Sekiguchi, Yutaro Shimokawa.

哈薩克：
Aigul Zabirowa, Bayan Smagambet, Adil Rodionov, Gani Madi.

波蘭：
Jakub Barszczewski, Paulina Domagalska, Adrianna Drozdowska, Łukasz Dulniak, Anna Gańko, Krzysztof Gubański, Kinga Jakiela, Justyna Kościńska, Kamil Lipiński, Mikołaj Mierzejewski, Karolina Mikołajewska-Zajęc, Adam Müller, Zofia Penza, Teresa Teleżyńska, Anna Wandzel, Jacek Zych, Łukasz Żołądek.

羅馬尼亞：
Cosima Rughiniş, Raisa-Gabriela Zamfirescu, Costinel Anuţa, Maria-Loredana Arsene, Tatiana Cojocari, Florina Dincă, Andrei Dobre, Diana Alexandra Dumitrescu, Iulian Gabor, Rodica Liseanu, Mădălina Manea, Mihai-Bogdan Marian, Anca Mihai, Andreea Elena Moldoveanu, Oana-Elena Negrea, Mioara Paraschiv, Ion Daniel Popa, Susana Popa, Diana Pruteanu Szasz, Ioana Silistraru, Adriana Sohodoleanu, Andreea Vintilă.

俄國：
Elena Zdravomyslova, Anna Kadnikova, Asja Voronkova, Lubov' Chernyshova.

臺灣：
何經懋

土耳其：
Gül Çorbacioğlu, Irmak Evren.

媒體顧問： Gustavo Taniguti.

> 本期內容

主編的話：接下來呢？ 2

> 世界各地的訪談

後革命的埃及：訪談Mona Abaza
Michael Burawoy, 美國 4

質問實在：訪談Luc Boltanski
Laura Chartain & Marine Jeanne Boisson, 法國 8

南非的卓越機構：訪談Sarah Mosoetsa
Michelle Williams, 南非 11

非裔美國女性的代表：訪談Patricia Hill Collins
Labinot Kunushevci, 科索沃 15

> 新加坡社會學

李光耀過後
Vineeta Sinha, 新加坡 17

多種族文化過後
Noorman Abdullah, 新加坡 19

精英統治過後
Youyenn Teo, 新加坡 21

世俗主義過後
Francis Khok Gee Lim, 新加坡 23

全球化過後
Daniel P.S. Goh, 新加坡 25

> 波蘭的墮胎政治

邁向不自由的未來：反性別主義和反全球化
Agnieszka Graff, Poland, Elżbieta Korolczuk, 瑞典 27

在波蘭捍衛生育權
Julia Kubisa, 波蘭 30

> 特輯

ISA青年社會學家網絡
Oleg Komlik, 以色列 32

翻譯《全球對話》成印尼文
Kamanto Sunarto, 印尼 34

介紹印尼編輯團隊 35

> 後革命埃及的命運

訪談Mona Abaza



Mona Abaza.

Mona Abaza是開羅American University的社會學教授。她也是知名的當代埃及學者，著述豐富，包括了《Debates on Islam and Knowledge in Malaysia and Egypt: Shifting Worlds》(2002)，《The Changing Consumer Culture of Modern Egypt》(2006)，《The Cotton Plantation Remembered》(2013)。Abaza也在瑞典、新加坡、德國、法國、馬來西亞、義大利、荷蘭等國擔任訪問學者過。近幾年她寫了關於埃及當代政治變遷的許多文章，其中兩篇刊登在《全球對話》過(1.4期和3.3期)。這篇訪談則是由Michael Burawoy進行的，Abaza主要談論2011年1月25日的革命以來的後續變化。

MB：妳寫了很多的文章探討2011年1月25日的「革命」事件，包括了兩篇刊登在《全球對話》的文章。該事件終結了穆巴拉克(Mubarak)總統的30年統治，並且開啟了一系列的政治過程，最終莫西(Mohammed Morsi)被選為總統，但這個伊斯蘭政權非常短(2012-2013)。在2013年7月Morsi被革職了，軍隊掌權，賽西(El-Sisi)將軍掌權，並且在2014年成為總統。妳現在怎麼看待這紛擾的六年，又怎麼看待軍隊的角色？

MA：關於軍隊的介入，其實是相當有爭議的，因為當初的Tahrir廣場在穆巴拉克被罷黜之前，軍隊坦克開進了廣場周圍的街道。軍隊被認為是保護廣場的抗議民眾。而這個抗議事件若沒有美國的默許和對軍隊行動的支持，是不會成功的。若是要說當時存在著「人民」和軍隊那時候形成的一種「兄弟情誼」¹，後來也有許多文章描述的軍隊的支持度其實已經下降很多了。

要記住的是，有一張影像在2011年被傳遍全球，那是一張抗議者在坦克車下面睡覺的畫面。另外的一張照片是在坦克上寫滿了反對總

統穆巴拉克的口號，還有一張是一個年長女性在穆巴拉克總統去職之後在Tahrir廣場上親吻士兵。但是，我們也不應該忘記的是，軍隊也於1月28日佔領和包圍了電視台大樓，這可以被看成是1952年7月的政變中推翻法魯克國王的Free Officer佔領了廣播電台一樣的象徵。然而，佔領軍事最高委員會(SCAF)之後，軍隊的支持度就下滑了。那些在Tahrir廣場上攻擊人民的事件，對女性抗議者的性侵和施暴，Maspero的屠殺，Said港口的Ultra Ahly的謀殺，以及Mohammed Mahmud街道上的殺戮等等，這些都讓軍隊成為反革命的象徵。

回首過往，我們應該質疑把軍隊看成是站在抗議者這一邊的詮釋。當時這樣的一個軍隊介入或許和支持自由民主不太有關係，而是軍隊掌握了這個可以擺脫穆巴拉克的機會，因為他兒子賈麥爾穆巴拉克(Gamal Mubarak)所代表的裙帶資本主義和軍隊所欲掌握的經濟利益是有所衝突的。但是，軍隊把莫西罷黜的事件則是另外的故事了，因為賽西被描述成民族的英雄，挺身對抗穆斯林兄弟會所代表的全球伊斯蘭的結盟。



Kasr al Aini牆，被移掉且置換上了一扇門。Alaa Awad塗鴉。Mona Abaza攝影。2012年12月7日。

MB：我們會回頭討論國族主義意識型態和其經濟基礎，但是軍隊也想恢復舊秩序，不是嗎？

MA：的確，在2011年1月之後，軍隊可說是無所不在，特別是在都市重塑的過程之中。集體記憶中，軍隊的坦克在城市中心這樣的一幅景象可說是在2011到2014年之間出現、消失，再出現。我們見證了圍牆被剷除，並作為抗議者和警察之間的緩衝區，市民把圍牆拆掉，以及為了安全把整個區域圍起來等。當時警察也攻擊和殺死了許多人，而致命的催淚瓦斯則奪取了許多人的性命。新成立的軍隊組織後來在街道上遊行。其中一個高潮的事件是，2013年8月的Rabe al-‘Adawiyya之對於穆斯林兄弟會的屠殺。而兄弟會日益增多的軍事恐怖攻擊，也讓軍隊的行動被看成是向恐怖主義宣戰，特別是在巨大的、圍繞著官方建築和領事館的一座凹牆被剷除之後(學巴格達的國際佔領區)。有許多影像都顯示了都市日常生活如何地被軍事化，也導致了一種新的生活模式，包括了處理、包圍、抵抗軍隊的控制。

MB：在都市生活的軍事化背後，對於競爭去控制經濟這點，發生了什麼事情？

MA：Zeinab Abul-Magd的重要一手著作²或許指出了軍隊在介入經濟運作中的角色，也解釋為什麼其行動總是不被看見的。按照他的說法，軍隊介入經濟場域已經好幾十年了，大概占了25%到40%的埃及經濟規模。這包括了各種大型的計畫，大型的食物和飲料生產工廠，咖啡店

和加油站等等。像我說的，這解釋為什麼軍隊選擇要罷黜穆巴拉克和他的兒子，因為其裙帶資本主義組成了對抗軍隊的另外一股勢力。

但是最重要的是，軍隊向來可以取得大量的房地產，這是由於有法律允許他們去取得土地作為商業用途。軍隊在各種超大型計畫中的介入代表著有巨大的有利可圖的機會。這在Mada Masr的報告中有關軍隊土地計畫部門的記載一樣，軍隊和阿布達比的Sheikh Zayed一起取得了新首都的16,000公頃土地和建築管理權。³早先一年，賽西宣佈了軍隊介入400億的房地產開發案，這是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Arabtec Company一起進行的。⁴然後Cairoobserver告訴了我們於2014年國防部簽署和Emaar公司(於大公國)的協議，要去建造一個巨大的Emaar廣場，會包括在開羅市中心有座大型購物場，和Tahrir廣場的新自由主義由Dubai出資的市場相互競爭。這種市場經濟的夢是透過威權的軍隊統治而得以可能的，在這之中，軍隊控制了大量的土地市場，並且交易不透明。⁵當然，這不是市場經濟和威權主義攜手的第一次。

MB：妳描述了賽西將軍的掌權對經濟精英意味著什麼事情。而這對於其他人，像是在阿拉伯之春成名的廣場街道上的人，那又意味著什麼？

MA：在莫西短暫的伊斯蘭統治之後，對許多人來說，軍隊的佔領意味著秩序的恢復。但這也似乎意味著舊政權的政治和經濟精英的復辟。在2011年1月之後，人們見識到了匪徒治國(即

>>



新建立的牆，就在開羅American University的大門前面。Mona Abaza攝影，2015年9月21日。

使這是舊政權時代的匪徒)帶來的犯罪和暴力。上千名的小販商家佔據了所有可能的空間，包括各種角落、街道、橋上，然後阻礙的交通。對於中產階級來說，這是可怕的「失序」。但是，這其實告訴我們的是：許多年自由主義的失敗，造成了當時的這幅景象。賽西對於城市的復興是透過「清理」市中心的手段，趕走小販，但這些人可說是非正式部門的大眾，將近五百萬人。

MB：所以軍隊試圖想要奪回對於街頭的掌控，是一種權力的負面形式。那El-Sisi有試圖要維護人民對於軍隊的支持嗎？

MA：和西方專家認知相反的是，賽西藉由秩序和穩定等的敘事去獲取支持度的，這事實發生早於他擔任總統之前。而又如何可以理解蘇伊士運河所召喚的強大人民參與和情感動員呢？短短的幾個星期的時間，地方就資助了85億，這顯示了賽西能夠動員國族主義情感的能力是相當可觀的。⁶

David Harvey提醒了我們路易拿破崙的巴黎復興是如何依靠城市的資本取得剩餘價值而得以可能。⁷在拿破崙統治下巴黎的轉變是和君主專制和權利剝奪一起產生的，這和賽西政權有著驚人的相似度。兩者都把蘇伊士運河看成是國族打造計畫的一部分。拿破崙資助了運河的挖掘，而賽西則是擴大之。「復興」的部份則也非常相似：兩者都承認基礎建設的擴張對於取得城市的資本是很必要的。例如，埃及的軍隊非常忙碌地建造公路和橋樑，連結城鎮到開

羅。

MB：這比較是最有趣的地方，但是若我們看看歷史上，妳會怎麼比較賽西和納賽爾(Nasser)的國族主義？

MA：的確，當莫西於2013年被軍隊罷黜之後，賽西常被人們拿來和納賽爾比較，賽西強調的國族主義敘事和和穆斯林兄弟會的國際組織是相反的，後者被描述成是恐怖主義和危險的。當最近的一次「新蘇伊士運河」於2015年8月啟用後，賽西再次觸動了國族主義的核心。啟用典禮上的船屬於前第一家庭，而這同一個被用於1869年蘇伊士運河戴著歐仁妮皇后的船。該典禮可以被詮釋成是展現國家民族的榮耀的象徵，並連結到殖民/殖民母國文化，帶有新自由主義的味道。法國總統賀蘭德在典禮上被廣泛的注目，可見一斑。很有趣的是，1956年蘇伊士運河的國有化甚至難以比擬。

MB：非常好，所以你指出了那些大型計畫想要投射國族主義的情緒，但是，至於對於日常生活的國族主義建築呢？我知道妳對於都市建築很感興趣，這個場域有什麼變化嗎？

MA：這裡我們也可以看到過去國族主義的遺跡和改變。我們現在講話的同時，Belle Époque城區中心(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建造)就歷經了許多表面漂白的工程，例如Talaat Harb廣場周圍的建築，這就像是穆巴拉克任內所作的如出一轍。⁸Orabi廣場也被轉變成行人廣場，且政府也關閉了許多Sherifein街道上的咖啡館，再一次

>>

地，這些可以被詮釋成民粹的轉向，提振民族意識，恢復街道的秩序。

MB：另外，有經濟利益在這個民粹主義下被隱藏起來嗎？

MA：是的，重塑Belle Époque市中心是很多資本家和巨賈有興趣做的一件事情，其歷史性的建築很吸引他們的目光。而Al-Ismaelia房地產商已經取得了開羅市中心的許多代表性歷史建築，像是Art Deco Gharib Morcos Building (1916建造)、Kodak Buildings (1924)、Davis Bryan Buildings和Abdel Khalek Tharwat Buildings (1920年代建造)、以及Cinema Radio (1930年代建造)。⁹

MB：所以說國族主義的計畫隱藏了經濟的利益，但是，還有其他的利益在 El-Sisi 的民粹主義之中在作用著嗎？

MA：的確，秩序的恢復和穩定這種論述已經遮蔽了對於人權侵害的注意，以及示威者的入獄和消失的事實。這樣都似乎都比過去還受到更少的注意。然而，主要的問題仍然沒有被解決，而且警察鎮壓還在持續著。沉默的大眾逐漸累積了不滿，預示另外一場社會衝突的誕生，但是，這對抗軍隊的代價是很大的，所以另一場暴力衝突將不可避免。■

來信寄給Mona Abaza
<mona.abaza@gmail.com>

註1：See Ketchley, N. (2014) “The people and the army are one hand!”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56(1): 155-186.

註2：Abul-Magd, Z. (2016) “The Army and the Economy in Egypt.” *Midan Masr*, August 7, 2016, <http://www.midanmasr.com/en/article.aspx?ArticleID=222>

註3：Sawaf, L. (2016) “The Armed Forces and Egypt’s Land.” *Mada Masr*, April 26, 2016, <http://www.madamasr.com/en/2016/04/26/feature/economy/the-armed-forces-and-egypts-land/>

註4：Saba, J. (2014) “The military and the state: The role of the armed forces in post-30 June Egypt.” September 27, 2014, <http://www.dailynewsegypt.com/2014/09/27/military-state-role-armed-forces-post-30-june-egypt/>

註5：“From Tahrir Square to Emaar Square,” *Cairoobserver*, February 23, 2014, <http://cairoobserver.com/post/77533681187/from-tahrir-square-to-emaar-square#.WHN1ptLhCM8>

註6：Oakford, S. (2014) “Egypt’s Expansion of the Suez Canal Could Ruin the Mediterranean Sea,” October 9, 2014, <https://news.vice.com/article/egypts-expansion-of-the-suez-canal-could-ruin-the-mediterranean-sea> (accessed December 2, 2016).

註7：Abaza, M. (2014) “Post January Revolution Cairo: Urban Wars and the Reshaping of Public Space.”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published online September 30, 2014.

註8：Ibid.

註9：<http://al-ismaelia.com/buildings/>, accessed December 2, 2016.

> 質問實在

訪談Luc Boltanski

Luc Boltanski是當今最傑出的社會學家之一。他是Pierre Bourdieu的之前的合作者，也是法國巴黎高等社會科學院(EHESS)的研究院長。1990年的時候，他就在與Eve Chiapello合寫的書《The New Spirit of Capitalism》(1999，巴黎)中分析了資本主義的組織和宰制的新形式。然後，其研究轉向了批判行動的研究和國家社會學。2009年出版的《De la Critique》在2011年就了英語譯本，稱為《On Critique》，是一本反映出他對於制度和實在之間關係的轉折點的作品。2012年其出版了《Enigmas and Plots》，這本書是關於偵探小說從19世紀的誕生與傳播的研究。

訪談者是Laura Chartain和Marine Jeanne Boisson，皆為EHESS的博士候選人。其聚焦在新書《Enigmas and Plots》，並討論用來質問和批判制度的工具和取徑。我們特別感謝Alex Barnard, Nathalie Plouchard-Engel和Emily Murphy把法文訪談翻譯成英文，以下是訪談的節錄，完整版可到Global Express看到。



Luc Boltanski.

LC & MJB：首先想問的是，你怎麼想到要去研究偵探小說的？

LB：我完全（或幾乎完全）不是偵探小說的讀者！就像其他人一樣，我只有在睡不著的時候才會讀。可是基本上我想要去理解為什麼這樣的一種體裁，不怎麼特別有趣，也透露出許多社會的保守觀點的文學形式會有那麼大的吸引力。的確，這是一個主要的敘事體裁，不論是書、電影、電視都是，這很有趣。

我的生涯讓我自己融入到研究調查，以及在自傳的程度上我有一位記者的兒子，我想要檢視不一樣的研究調查。當我寫這本書的時候，「外遇」和「政治醜聞」是薩科奇總統任內常出現的字眼。這些外遇和醜聞讓調查和反調查得以可能。我問我自己，為什麼「調查」在當代西方世界扮演了那麼重要的角色？這個問題讓我去探討各種調查之間的相似性和差別，以及各種進行的方式。

LC & MJB：你曾試圖要去找偵探小說的起源嗎？

LB：這是一個古典涂爾幹的取徑，同時也是傳科式的考古學取徑。當我們在變成布迪厄掌所說的場域影響產生之前掌握了某個現象的起源時，我們對之的理解會更好。第一，一個新的體裁被創立了，然後作者們試圖要去區別自己和他人。也就是他們怎麼修改體裁，一個多世紀以來，我們已經看到這種不同形式的偵探小說。我試圖去回到這個體裁產生的原點，去透過半結構的方法研究偵探小說和其誕生的歷史脈絡。但我把這本書視為一個起頭，提出問題，而非答案！

LC & MJB：在《Enigmas and Plots》中你發展出了一個概念，就是說每個研究都可以是被社會行動者所帶領的，因為當其注意到了被制度所形塑的「實在」和他們所經驗的「世界」

>>

存有鴻溝的時候，就得以可能。這個差距可以產生不同意，質疑、問題。你這本書指出了「謎題包含了一些在社會秩序中運作中足以可能撼動實在的某件事情。」

LB：的確。謎題對於偵探小說來說是很特別的元素，就像 Edgar Allen Poe 所發明的一樣。格式塔心理學家也處理了這個謎題的概念，其是從某個被認為是穩定和似乎不證自明的事情中而來的。這本書的概念基礎是奠基在我先前的一本書《On Critique》上的。該書我做了「實在」和「世界」的區分，這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區分。簡言之，實在指涉了被制度形塑的穩地的秩序，而世界指涉了那些社會行動者不能預測到的經驗。

這個區分目的是要去回應那些被實在社會建構論典範所提出的問題。這個問題在 Ian Hacking 的著名的書《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What?》中被提出，若每一件事情都是被建構的，那從什麼觀點來說我們得以掌握這些被建構的事物呢？難道解構，也就是承認了所有的事情都是被社會建構的，不也是一種新的建構嗎？難道這個取徑不會導致一種相對主義讓社會學家的研究都變成武斷的嗎？因此，我想把這個實在的社會建構觀點好好的研究一番，找出社會制度怎麼形塑了實在。透過區別世界和實在，我們可以找到參照點，然後去區分實在的建構和世界的經驗。因此，我們必須把從 Moore、Schütz、蘇格蘭啟蒙的「常識」的理論先放一邊。

另外，也有必要去從行動所產生的不確定開始。但是，當然我們的經驗都是定錨在實在中的，一個簡單的例子就是，當你等巴士的時候，你會期待巴士每 15 分鐘會來一班，這就是從實在中的形式中所經驗到的。巴士站牌、巴士公司、以及都市都一起建構了巴士站和時刻表。然而，巴士或許不會準時到站，因此，我們許多的經驗是透過世界的不確定而得到的，這些經驗很難去變得很明顯。

而被制度形塑的行動框架是比較容易去描述和整體化的，因為他們已經被國家（但不只有國家）透過選擇而客觀化。我們可以描述行動者面對了什麼樣的被制度形塑的實在形式，他們怎麼批判之，怎麼論述之，怎麼去創造新形式。批判有助於去解釋這個經驗的體裁。

因此，我想要思考實在的是會建構什麼和制度連結在一起，以及設定了什麼樣的媒介去減少不確定性。在《Enigmas and Plots》一書中我把歐洲民族國家的計畫，特別是 19 世紀後半的民主形式，看成是去結構實在並且讓行動可預測，透過法律以及警察，也透過社會和自然科學。我這個觀點被傳科的生物政治概念影響很大。

讓我講另外一個我喜歡的例子。我有個朋

友在 70 年代是個堅定的左派女性主義分子。她和其他人，有男有女，一起加入了極左派陣營。有一天，她發現到，盡是女性負責把傳單放到信封裡面，或是女性煮咖啡。所以她們後來怎麼樣呢？她們驅逐了男生，把女性自己鎖在一個房間討論了 24 小時。而那就是法國女性主義的誕生時刻！在那之前，那些人都有分析的經驗，所以也並不是無中生有。但我想這個運動透過學習而發展，透過社會學、心理分析、工會行動等等，透過掌握經驗並且去分享之。

LC & MJB：社會學家是怎麼解釋行動者的經驗的？

LB：若要去達成客觀性，社會學家必須去把描述的工具和那些可以讓我們批判性地去觀看這個實在的參照點連結起來。這不能被連結到某些特定的道德，因為這些批判參照點應該宣稱某些普遍性，這就像我在《On Critique》中所解釋的一樣。其中一個去處理這個議題的方式就是當行動者在批判的時候，去跟蹤他們。這些行動者都是實在論者，他們都會在行動的時候考慮當下的情境，以至於可以把脈絡轉化成優勢，例如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所以一個工人可以對老闆非常禮貌，但是在家卻是另一個樣。

我想我們應該跟著社會建構的過程，也就是人們自己建構世界的方式。一開始，每個經驗都是特殊的，都是獨特的，但是後來會分享經驗，然後趨同，用特定語言去描述，按照需求去改變，然後試著去建構新的論述，並且改變實在的形式。所以去仔細看批判的運作和其建構與解構實在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你透過閱讀小說去跟隨他們，也透過訪談、透觀察齟齬。社會學研究必須跟蹤建構和解構，並且去建立新的實在形式。

LC & MJB：你認為社會學家應該更進一步，並且從行動者和制度的行動計畫出發去分析他們所依賴的框架嗎？

LB：我現在認為不可能去從事一種完全實用主義、分析處境的社會學研究。而行動者也不是這麼行動的！行動者知道自己所處的環境是依賴於他們僅能夠有限地控制的決定，而作為個體，也依賴於那些他們認為是什麼就是什麼的制度，這些形塑了其處境。但是行動者也可以用自身的優勢去產生矛盾，並且影響制度建構現實的方式。從我一開始講的巴士的例子來說，他們可以顯示，雖然巴士必須準時，但是這從來沒有在現實中發生過。

為了去批判實在形式的創生，社會學不仰賴特定的道德論述，而是去看行動者如何去質疑那些實在，並且試圖去建立更公平的形式。但是，社會學家可能會試著進一步順著行動者

去建立新的實在形式。他們應該使用整體化工具，因為該工具客體化了行動者經驗所依賴的定化。他們應該進行幾乎不可能的操作，包括連結這種研究和規範性的判斷。在我的《On Critique》一書中，我透過社會學的歷史去描述這樣的操作怎麼進行。我的論點並不是一種「假說」，因為這很難用經驗去描述。但我認為實在的穩定化是很難在民族國家的框架下去達成的，因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會不斷地去干擾。這些資本流動威脅到了那些對於同質化某個領土中的人口相關實在的努力，許多的研究，特別是 Gérard Noiriel 對於邊界的強化的研究、對於身份證明文件的研究、以及語言的統一化，都分析了國家想要同質化領土和人口的努力。在法國，Jacques Revel, Dominique Julia, 和 Michel de Certeau 等學者在 30 年前就聚焦在這個主題上了。這個研究也部份參照了 Deleuze 的領土和流動的對立，因為民族國家一直被資本的流動所斷裂，在這社會脈絡下，偵探小說誕生了，這是超出了民族國家所可以也所意圖去建構的實在。

LC & MJB：這需要社會學家去超越民族國家的脈絡，發明一種新的整體化架構好得以掌握這個架構的創生和去穩定化嗎？

LB：是的，的確如此。我為什麼對於偵探小說的歷史和民族國家的形成之間的關係感興趣呢？為什麼我可以去做這研究？我會做這個是因為這個關係框架已經非常有危機了。同時，即使很難去描述外部性，我也從外部去觀察這個架構。透過思想實驗，我們至少可以超越民族和國家的框架。而對於今日的社會學家來說，核心問題是社會學的結構很大一部分是依賴於 19 世紀的民族國家框架，這對於法國來說是如此，但是不僅止於法國。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有英國社會學，德國社會學，法國社會學等等，今天我們也歷經了這個框架的式微和轉變，許多社會學的工具已經不再適用，所以我們必須重建新的方法去應付那些超越民族國家框架的挑戰。對於那些進入這個社會學技藝的人來說，這是你必須去做的是事情！■

來信寄給 Luc Boltanski <boltansk@ehess.fr>,
Laura Chartain <laurachartain@gmail.com> 和
Marine Jeanne Boisson <boisson.marine@hotmail.fr>

> 南非的卓越機構

訪談 Sarah Mosoetsa



| Sarah Mosoetsa.

南非的大學在種族隔離的遺緒下面對了極大的挑戰。我們看到了種族隔離導致了學生運動近來的興起，像是 #RhodesMustFall 和 #FeesMustFall。但是，這些不應該讓我們無視南非的新實驗：國立人文社科院 (NIHSS) 的成立及成功。這是非洲相當獨特的機構，由南非高等教育訓練部所資助，已經資助了許多新生代的博士生和學者，並鼓勵對話，討論南非的歷史和未來。該機構由 University of Witwatersrand 的 Sarah Mosoetsa 所帶領，她是著名的《Eating from One Pot》(2012) 一書的作者，該書描述面臨工廠關閉的家庭生存策略。這篇訪談由 Michelle Williams 所作，她是 Sarah Mosoetsa 在 University of Witwatersrand 的同事，該訪談聚焦在 NIHSS 的挑戰和成就。

MW：請告訴我們 NIHSS 的緣起？

SM：或許我可以從歷史脈絡開始講起。2010 年 Ari Sitas 教授和 Bonginkosi Nzi-mande 博士（高等教育與訓練部長）詢問我去成立一個兩人的工作團隊去研究南非的高等教育人文與社會學科的狀況。部長關心的是人文和社會科學已經讓位給 STEM（科學、技術、工程、數學）。這個印象是因為人文社會學科並不在國家變遷的前沿。所以該工作團隊的任務很廣，要找出事實，並且以訪問國內的學者為基礎。Sitas 教授是團隊領導，我則是副手。

作為教育部的任務團隊，我們拜訪了所有的大學，並且和學術從業員、管理階層、校長、系所等進行交流。我們發現到很令人驚訝的事實，因為我們發現自然科學固然很重要，但是它們的成長是以犧牲了人文社會科學為代價的。所以高等教育分裂為二，但是，我也發現了人文社會科學成功的故事。

MW：所以這就是 NIHSS 的開始嗎？

SM：是的，任務團隊後來寫了報告，叫做「人文社會科學章程」，報告列出了挑戰，以及人文社科如何可以復興並注入新的能量。該報告建議設立國立人文社會科學院 (NIHSS)，部長採納了建議，而我們馬上著手開始準備設立。2013 年 12 月該院初步成立，理事會後來在 2014 年 5 月詢問我作為院長，然後，我就和理事會一起規劃成立的細節。

MW：據我所知 NIHSS 有很多部門，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嗎？

SM：總共有 7 個主要部門。讓我從介紹博士獎學金部開始。每一年我們發給南非的學生獎學金就讀博士。關於這點，我們和南非所有的公立大學人文社科院長們密切合作，院長會推薦學生給我們（他們內部的審核）。然後 NIHSS 有自己選擇這些被推薦者的標準，這是個透明的過程，一開始會對所有的學生發出申請邀請。受獎者有 80% 黑人學生，60% 女性。截至 2016 年底止，共 451 名學生獲該獎學金，此外，也有 111 名受獎者是其他非洲國家的學生。

MW：那很有趣。所以你們也資助非洲其他國家的學生嗎？

SM：是的，我們有一個特別的非洲願景計畫 (African Pathways Programme, APP)，這是認識到南非其實接受了許多來自其他非洲國家的學生。透過 APP，我們每年提供了 37 名獎學金，這個想法是期待我們可以給其他非洲國家鼓勵，也一起為 NIHSS 注入活力。我們希望走出歷史，和其他國家合作。

MW：可以多談談這個合作嗎？

SM：作為一個新的機構，我們必須和其他非洲國家合作，特別是多數沒有類似的機構。我們和非洲社會科學發展委員會 (CODESRIA) 一起選擇學生和合作，這個合作關係發展的相當好。

NIHSS 也設立了非洲願景流動計畫，這是被歐洲伊拉斯莫斯世界計劃模式所啟發的，為的是去研究非洲大陸，然後找到新的研究想法。我們資助研究的旅行，建立聯絡人和網絡，並致力教學和研究合作。

MW：回到南非，我想知道是否有困難找到足夠的博士生？

SM：這是好問題啊！的確，我們頭兩年是有困難的 (2013-15)，因為要讓他們知道有學生被獎助，這一開始比較難。現在我們已經著重在學生的素質了，確保他們可以畢業。在南非我們的畢業率大約 50%，所以我們還成立的導師計畫去幫助學生。

MW：那聽起來很重要，可以跟我們說這個指導學生的計畫嗎？

SM：21 個現任和退休的教授被派去指導學生，例如，在 Western Cape 我們成立了地區的博士班，配有兩個導師。導師要定期和學生會面，提供指導和建立關係。他們提供了各種研討會，討論方法、理論、寫作等。導師提供經驗，但學生也相互學習。我們把同儕學習視為非常重要的一環。讀博士是很孤獨的，而這個計畫幫助形成了一種團隊連帶情感，導師也很慷慨，甚至幫助了大學的轉型。我們有辦法借助退休教授的經驗和技巧，並且讓他們有機會去成為轉型過程的一部分。

MW：除了資助博士生之外，NIHSS 有其它的運行模式嗎？

SM：是的，我們有一個至關重要研究計畫。這資助了創新和前瞻的研究，鼓勵學者去走出舊的研究問題，找新思考方式，新的方法，新的網絡。這個計畫或許從以往的贊助者那邊沒有辦法保證得到捐贈，但是，我們會有其他的贊助者。我們也認識到一個事實，就是人文社科

>>

學者是以寫書為主，但是，贊助者主要是寫期刊文章。最後，這個計畫也補助榮譽優秀大學生和碩士生。

MW：這樣的「非主流」研究通常可能很難找到出版的刊物，你們可以在這方面提供幫忙嗎？

SM：像我說的，我們資助、開啟、並合作計畫，這不僅僅限於學術研究和博士生。我們發現有些很好的作品並無法發表，因為出版社認為作品雖好，但是並非「財務上可行」。我們不會告訴出版社要發表什麼，但是，我們會資助那些和我們的目標有共鳴的作品發表。但是還是要通過出版刊物的同儕審查的過程，我們會資助出版所需的費用，或是預定一定數量的書籍，或是直接補助出版。我們也資助會議的出版品。

其中我們最引以為傲的是國家圖書獎和創新獎，這從 2016 年 3 月剛剛開始。我們獎助 6 名，包括了非小說和小說書籍，編輯叢書，數位媒體以及藝術。獎助是限定給南非的大學學者。而第一個獎助是給從 2013 年到 2014 年的出版品，我們對於申請的數量可說是應接不暇，這代表了人文社會學科的蓬勃發展。我們於 2017 年 3 月會有另一次獎助。

MW：南非向來有學術介入公共事務的傳統，你對於這點有什麼計畫藍圖嗎？

SM：事實上，我們有個人文學科匯集部門 (Humanities Hub Program)，資助在主流學術場域之外的知識生產。我們首先在 Liliesleaf Farm 開始試辦，因為其有著豐富的歷史，是 60 年代地下解放運動的發源地，也是 Rivonia 審判人士被捕的地方。遺憾的是許多學者和學生並不知道這個地方。而這個計畫也把這樣的歷史地點轉變成知識寶庫，以及促進另類思考歷史事件的地方。Liliesleaf Farm 會主辦會議，以 Freedom Charter 為核心，提供不同思考歷史和推動對話交流。像你說的，我們從解放運動學習到好的想法是可以從學術與非學術之間激盪出來的。

MW：可不可以跟我們說一下這些方式的具體例子呢？

SM：我們的「人文學科匯集」主要是讓學生對於人文社科感興趣。例如，高中生會到 Liliesleaf Farm 參訪，學習歷史。這是一種新的教學方式。但是也不是適用到所有學生，所以我們還發展出了移動展覽，把「小小的 Liliesleaf」帶到像是南非大學，Venda 大學，或是 Limpop 大學的校園去。

這是一個非常新穎的講述人文社科故事的方式。它讓不同歷史的對話、關於自己的對話、以及自由憲章的對話得以可能。我們發展出了自由憲章表格，必有建議欄位。我們問人們兩件事：第一，如果你將要重寫自由憲章，你會納入什麼？第二，自由憲章的那一個你最喜愛？人們有各種不同的絕妙的答案，並且浮現出許多議題，像是失業、貧窮等議題。Liliesleaf 是個先導計畫，我們也計畫去把「人文匯集」帶到其他的地方。

MW：NIHSS 有國際的部門嗎？

SM：透過我們的南方 -- 南方網絡，我們已經開啟並資助了印度 - 南非研究計畫，是和印度社會科學委員會一起合作的。我們和其他國家像是巴西等也研究類似的合作計畫的可能。

我們也協調組織了金磚五國南非智庫，這是一個給五個新興經濟體的組織：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南非。那裡有各種不同的部門，像是商業、學術、社會等，我們組織學術部門，包括了和五國的學術論壇，都是接在金磚五國高峰會之後。這個組織主要把重點放在政策和獻策給政府。每年主題不一樣，像是社會安全、健康、教育、能源，主要由地主國決定。論壇會通知高峰會以及國家的領導提供政策建言，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建立學術和政策制定之間的關係的界面。

MW：在那麼短的時間內可以有如此的成就，相當令人驚訝，而你遭遇過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

SM：我想我們走了很長的一段路，我們機構至今只有三歲，但是完成了很多事情。NIHSS 由高等教育訓練部所資助成立，但是在政府部門的框架下做事其實有很多挑戰，我們完全仰賴政府的支持，事情的推動都是透過官僚體系。沒有政府，其實什麼事情也不能做。整個過程也是集體的，我們和理事會密切合作。

一開始我們面對了來自學界的反對，有些人擔憂我們會取代了原本的校系，搶走資源，並讓高等教育部掌控了一切。但是，當初的反對者如今都成為了最大的支持者。NIHSS 是一個法人，對獨立的理事會負責。我們知道我們不會取代原本的大學，反而是互補。

一些日常生活的挑戰是和部門的運行有關的。我們仍然在設置內部的系統。例如，我們實驗一些新的 app 去讓導師計畫可以更好地運作。作為新的機構，我們也學到了很多。我想是需要 3 到 5 年去讓整個機構到位。我們很高興有目前的成果。

MW：NIHSS 的未來願景為何？

SM：我想可以在這麼短的時間內讓 NIHSS 成真，是很棒的！部長是很重要的一環，但並不是唯一的一環。部長的支持讓我們可以蓬勃發展，他是真的看看我們的文件，和我們交流，提出問題，並且支持我們。這是 NIHSS 最好的獎勵。有些人想知道若是部長去職之後會怎麼樣，我想，政治在任何地方都是流動，所以這是個問題，但是我們努力去讓人們知道我們的成果，我們已經確保了 2019 到 2020 的資金，屆時，我們希望有 300 名博士畢業，舉辦 4 個獎助循環，而且最後獎助 40 本書的出版。若這個達成了，我們就 算是大功告成了。我們已經是在最短時間內達成最多事情的組織了。

我很高興，也很戒慎恐懼，也很興奮。我們南非的人文社科擁抱了這個機構。我對於學者們的回應感到很喜歡，當我要求審查文件、當評審、指導學生等時，從來沒有被拒絕。學術界把我們當作一項寶貴資產。■

來信寄給 Sarah Mosoetsa <mosoetsa@nihss.ac.za> 和
Michelle Williams <Michelle.Williams@wits.ac.za>

> 美國非裔女性的代表

訪談Patricia Hill Collins



Patricia Hill Collins.

Patricia Hill Collins是University of Maryland的傑出社會學教授，也是美國社會學會的前會長。她是頂尖的社會理論家，其發展出的概念像是「多重壓迫」，「交織性」，「局內的局外者」等都是在她著名的經典著作《Black Feminist Thought》(1990)，《Fighting Words》(1998)，以及《Black Sexual Politics》(2006)中所發展的。以下是Labinot Kunu-shevci (科索沃University of Prishtina的碩士生)對其進行的訪談節錄。

LK：從妳的觀點來看，什麼是研究社會不平等最適當的理論和方法取徑？

PHC：對我個人來說，我是從研究「宰制論述」開始的，因為西方的宰制論述包括了知識的生產與形成，這個過程產生了霸權觀念和實做。這個宰制論述主導了知識辯論的方向，譬如：什麼是重要的問題？什麼稱得上是證據？什麼又可以被忽略、視為次要的？在美國，宰制論述透過種族、階級、性別、性傾向、國家等的權力系統交織而被形塑出來。我的研究中指出了種族主義、性別偏見、階級剝削、異性戀霸權如何運作而形塑了社會群體的生命經驗。黑人女性的經驗是進入這個權力與知識相關問題的切入點，但是黑人女性的經驗不會是終點。

我研究美國非裔女性所面對多重權力體系所共同建構出的社會問題。以暴力為例，加諸

在非裔女性的家庭暴力是透過她們的男友、丈夫、父親而施加的，而這些家暴者的行為又是在國家所默許的對待黑人的種族暴力和奴隸制度、種族主義的遺緒與脈絡下發生的。這兩種暴力相互賦予了彼此意義，兩者是相連的。而我也研究黑人女性主義，去看黑人女性知識分子和運動者，像是 Angela Davis, June Jordan, 和 Kimberlé Crenshaw，她們怎麼論述了黑人女性面對的困境與問題是無法透過單單研究單一的宰制系統而獲得解決。她們透過研究黑人女性的特殊經驗，提出了壓迫的同時性的問題，這也開啟了一個蓬勃的知識領域，我們現在稱之為交織性 (intersectionality)。

權力系統的結合形塑了宰制論述，不同社會的宰制論述是可能不同的。譬如說，美國的種族、階級、性別、性傾向、公民身份的交集

>>

反應了美國歷史的特殊性。我的理解是，像是你的國家科索沃，是一個新的國家，有不同的力量在形塑著宰制論述，例如可能是族群、階級、宗教，這是科索沃歷史的特殊性而導致。不過有一點很重要必須記住的是，不論歷史有多麼不同，精英群體總是掌控著論述和知識。不同的社會有不同的精英群體，但是社會不平等的權力關係意味著雖然社會中每個人都被宰制論述所影響，但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有辦法去形塑宰制論述。

回到研究社會不平等最適切的理論和方法這個問題，這有賴於一個人處於知識生產中的權力關係的位置，以及那一個知識領域是你想要去加入的。我的話，我是選擇與理論的領域對話，認為當注意到了知識的認識論基礎之後，就更接近權力的核心。我研究權力關係的各種不同面向，特別關照如何形塑知識。以這個觀點而言，交織性的架構是很好研究社會不平等的切入點，在學術和政治之中皆是如此。

LK：媒體對於女性壓迫和解放的再現，其扮演的角色為何？而又怎麼影響了女性再公共領域的參與？

PHC：所有的女性都經驗過大眾媒體怎麼呈現女性要如何成為女性。但不同的社會會有不同的女性再現。在美國或是類似的多文化社會，媒體的女性再現是在不同程度上由種族、性別認同、族群、階級、公民身份等而交織成。白人中產階級異性戀美國女性是其他女性的模範與理想，這是一種社會建構。傳統上，這個女性理想形象是家庭主婦，但最近這變成了女性從事高薪的工作。在多元文化中，其他群體的女性若是越接近這個理想形象，她們就越會受到歡迎。

在《Black Feminist Thought》一書中，我看的是美國非裔女性所面對的四個刻板偏見：第一是騾子 (mule)，就是女性就像動物般的工作不會有怨言。第二是耶洗別 (jezebel)，是一個高度性慾化的女性，像是妓女一般。第三是老媽子 (mammy)，黑人的女性家務勞動者，對於僱用自己的人有著高度的忠誠。第四是黑人女士

(Black lady)，指的是受過教育的黑人女性放棄家庭而選擇職場。但是這些再現不僅只是刻板印象，對於過往種族主義、性別、階級壓迫的時代錯置，它們還掌控著對於黑人女性如何被對待的社會腳本。更重要的是，黑人女性被期待著去內化這些腳本。

女性主義和女權主義運動是希望去打破這些刻板再現和所代表的權力關係。當女性拒絕成為家庭主婦、騾子，拒絕低薪和沒有保障的工作，或是拒絕當一個總是聽命丈夫和上司的服從者，那麼她們就是有意識地介入了公共領域。再現的改變是可以改變行為的，而行為的改變則可以改變公共領域中對女性的看法。■

來信寄給 Patricia Hill Collins
<collinph@umd.edu> 和
Labinot Kunushevc
<labinotkunashevc@gmail.com>

> 李光耀過後

Vineeta Sinha,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ISA出版副會長, 2014-2018



觀音寺廟的華人在擲交抽籤，在南興都廟附近。Daniel Goh攝影。

的自主性。

學術和非學術的論述都把新加坡緊緊的和李光耀連結在一起，以及其不妥協、威權的政治。新加坡公民已經被典型描述成了一個保守、害怕、臣服、被動的面貌。然而，新加坡人也長期批判高壓統治，「用鐵鎚去敲開堅果」的治理方式，這是一個整合但有時很累的公共論述。

而政治結構和社會科學的關係為何？新加坡的社會學已經長期以來透過李光耀的觀點來論述。後殖民的新加坡領袖以經濟成長為優先，這反應了新興獨立國家的需要，因為經濟發展和被規劃的社會變遷是急迫的。社會科學研究（多數由國家補助）也被認為要「相關」，若不是直接和現代化有關，也必須符合國族建設的需要。從1970年到1990年，社會科學知識的生產是主要去提供新加坡快速社會文化、經濟、政治的資訊，反應民族國家管理多族群、多宗教人口的優先傾向。

然而，最近大學裡的社會學家和國家利益的結盟—從來不是絕對的—變得比較脆弱了。新加坡的社會學家已經問題化了國家的論述和多元文化主義、精英統治、家庭、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歷史、多宗教性、宗教和諧、貧窮和不平等的缺乏等等。新加坡政府也開始建立自己部門研究的能力，這可能降低對於學術研究的依賴。

不易外地，李光耀 2015 年

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似乎成為了新加坡這個民族國家認同與存在的代表。而新加坡式的治理和李光耀的確有關，而且也源自於他，被稱為「實用威權主義」、「軟性威權主義」、「啟蒙專制主義」、甚至「良性獨裁」。國家對此的論述堅持著精英統治、多元文化主義、法制的原則，為的是一個乾淨的政府、有效的官僚體制、現代化、經濟成長與繁榮、以及世界上高的人均所得。召喚了一個接受其族群的社會文化差異、賦予「平等」給各方的意識型態（見Noorman Abdullah 本期的「多元族群主義過後」一文），這樣的論述不是關於數字的相等，而是機會的平等，以表現為優先，拒絕了官方和被制度化的族群歧視。但是這個強大的信念是在形成一個種族差異和種族主義上相當有挑戰性的，因為其已經讓經過計算的精英統治內部矛盾和政治隱藏起來（見Youyenn Teo 本期「精英統治過後」一文）。

新加坡的政治管理和治理風格總是以規劃、效率、控制、管制為優先。社會的日常生活運作是被官僚看成是潔淨誠實的實做，而且有效率，並且可能太有效率了。從英國殖民承襲而來的是，這樣的「下層建築」已經被領導階層訓練且謹慎地再生產，確定遵從著被治理的行為模式，這是會讓韋伯驚訝且困擾的。中央集權的治理原則和緊密地和所有社會領域結合互動，這是需要一個很大的國家機器以及一個支持的官僚組織網絡才得以可能。國家就是透過這樣中介制度去施行政策、影響民生，也不可避免地是在無所不在的威權、實用主義意識型態下被制約。Carl Trocki 在論述新加坡的「控制的文化」的時候說新加坡國家是在後殖民時代中對社會「負起完全管理和監視的責任」。Chua Beng Huat 和 Kwok Kian Woon 也認為後殖民獨立新加坡的「國家介入擴張和集權」減少了日常生活各個領域

的過世觸動新加坡人發自內心的回應，這個國家弔詭新加坡現代化的建築師。但是有趣的是，這卻也是解放的時刻，不用受到國家約束和管制，並且邁向自由，包括政治在內。

但這個很愉悅的論調必須透過社會學的想法來平衡一下。作為一個研究新加坡的民族誌研究者，我的宗教研究是聚焦在日常生活的。若從廣泛的社會政治生活組織作為給定條件而言，新加坡的神聖領域也相似地鑲嵌著高度理性化的心智狀態，被官僚、行政、立法的邊框框限著。新加坡的宗教地景特殊性，特別是官僚文化以及對於宗教表述的影響，是需要被解釋的（看本期的Francis Lim的「世俗主義過後」一文）。

把新加坡的國家看成是一個介入型的國家是我研究的起點，這連結到了新加坡宗教地景的「複雜性」（messiness），可顯現「寺廟叢林」（jungle temple）的世界（在一般民宅中的寺廟，為的是躲避國家規範），以及宗教崇拜的場域如何緊密結合了印度教徒、道教徒、佛教徒、天主教徒的日常生活。因為宗教實做者在高度被包圍的場域中重新開創了一個神聖的地理空間和意識，所以新加坡都市的拓樸學顯示了「混亂」（disarray）和「失序」（disorder）的宗教場域，宗教典禮儀式甚至在體育館或是游泳池舉辦。而對於謹慎規劃的「神聖／世俗」和「公／私」區分的忽視就是李光耀年代新加坡宗教的典型特徵。這和把新加坡看成是被淨化、貧脊、被過度管制的社會這樣的法，是不同的。

而每一天又可以怎麼和政府的結構去進行協商呢？儘管官僚結構和介入的堅實存在，對於宗教試驗的渴望定義了新加坡的宗教領域。當國家介入的確重構了宗教場域，它並沒有拿掉了宗教創新與創意。管

制宗教意外地開啟了宗教自由。實際上，官方制度的迷宮允許了協商的空間，因為實踐者會去策略性地面對管制規範，達成其日常生活的目的。

我對於新加坡複雜的社會政治和宗教地景的田野研究鼓勵了我去探討被動與受壓迫公民的刻板印象特徵，這些公民是面對著高壓的威權主義，特別是李光耀。我的論述的確和對於新加坡的宗教幾不同，也和認為新加坡的國家控制過度決定了個體的生活、導致了馴服的、可與測的、甚至沒有能動性的行動者這樣的論述是相反的。

透過威權國家的觀點，學術和非學術的論述總是相當有信心且確定，不論說新加坡的故事已經廣為人知這點，或是說接下來要被揭露的是可以預測地既無趣又不鼓舞人心。關於新加坡的研究繼續和新加坡的社會文化與政治的詮釋抗衡，並且被過時的看法所影響。的確，當我呈現出一種另外對於新加坡社會的看法的時候，人們會解讀成我是威權國家的辯護者，或是被說是滿足於描述「微觀」的日常生活被臣服的公民的勝利、卻沒有認識到「巨觀」的政治機器霸權宰制。

因此，新加坡的社會學家有很多事情要做，必須不只是生產對於官方、霸權的關於新加坡會論述與解釋的替代詮釋，也必須去處理那些總是犬儒的對於新加坡社會的社會學想像與詮釋。要超越陳腔濫調和公式化的論述，邁向多元、另類替代的想像，對於社會與政治的需要必須看成是挑戰與野心。社會結構不是被個人所形塑的。而結構也不會一夕之間消失。真正的問題是：在現任總理李顯榮之後，新加坡的政治地景將會是什麼？■

來信寄給 Vineeta Sinha
<socvs@nus.edu.sg>

> 多元文化主義之後

Noorman Abdullah,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ISA感知與社會主題小組(TG07)成員



在Telok Ayer歷史遺跡的馬來和印度雕像，為新加坡的華人城區。
Daniel Goh攝影。

李顯龍在2016年8月國慶日的慶典上演講討論了新加坡的種族關係，並且希望弱勢族群可以有更多的政治代表。弱勢，在這個脈絡下而言，特別指的就是種族，不是性別、不是性傾向，也不是任何其它社會群體。有趣的是，在1989年，其父親李光耀堅持新加坡還沒有準備好有一位非華人的總理，而2008年的時候，李顯龍說這有可能但不會馬上到來”(The Straits Times, 2008年11月9日)。諷刺的是，國慶日的兩週後，新加坡的主要英文報紙The Straits Times刊登了一篇名為「誰會是下一位新加坡總理？」的文章(2016年9月4日)，報導中所有人都是華人的內閣成員。

李顯龍的演講揭露了一個持續的種族化新加坡社會。種族的重要性能和能見度從沒有被低估，並且夠過社會、政治、文化政策而增強，並且在日常生活中還是相當重要？這樣的政治與社會生活之霸權表述是從新加坡的多元種族文化模型中長出來的，「華人」、「馬來人」、「印度人」、「其他人」的類別就是官方的CMIO架構，並賦予每個種族自己的文化和語言。

以英國的殖民主義為基礎之上，CMIO多種族文化主義和精英統治一起建構了意識形態信條，形塑了這個從1965年從馬來西亞分離出來的國家，這是一種驅逐，是在馬來西亞和新

加坡之間對於保留華人和其他弱勢族群的權利所產生的分歧所導致的。這架構變成了後獨立新加坡國族建構的必要一部分：去保護和正當化新加坡作為小城市國家的生存，以及對不同族群和宗教團體的尊重。這樣的種族架構也被一致地轉譯到教育和語言政策、自我成長團體、公共住宅分配、人口控制、政治代表之中。

新加坡宣稱是一個種族中立的政府，國家平等地保護種族界線與關係，這是國家的利益所在。但是同時卻有政策允許政府去推動特定種族的更多人口生育。這個種族計算術矛盾地確保和維持了華人的多數優勢地位。當時的副總理以及後來成為總統的王鼎昌進一步宣稱對於某個特定族群的優惠並不違憲。事實上，多元種族文化主義的論述雖然給予不同文化平等地位，但也讓某些文化比起其他更平等。

然而更重要的是，作為一個社會組織去管理文化差異的預防方式，AMIO多元種族文化主義試圖去模糊掉和削減社會上有意義的族群、地域、語言、宗教、文化的不同，並塞入觀分的分類別中。這也加強了CMIO種族的界線，並透過認知、慶祝、卷繞進行著。種族或是延伸所謂的文化是被認為是政治和治理的類別，並且也被以本質主義、有邊界的、內部同質的方式去對待、分類、制度化。

此外，批判的對於文化慣習的討論通常被維持種族包容和和諧的努力而包圍。包容是透過疏離和把忍受被建構成不方便的事務而持續著的。另外一方面，也存在著最小程度的對於跨文化對話、互惠尊重、合作的強調，以及多元文化的興趣和好其延伸到了更深層的理解、知識、同理、接受差異的價值。這樣的結果只是一種沒有超出官方描述的文化差異的種族和諧。

然而同時間，另外在後獨立的新加坡的日常生活可能和想像和更複雜的種族、差異、多元文化的互動代表了是非常有潛力去超越國家介入與由上而下的規劃的。這些常生活跨文化實做是再沒有外部的介入的情況下有機浮現的，伴隨著文化的跨界和種族的跨界，作為文化生產者的人們是在一般的交流中與文化差異與變遷進行處理、協商、互動。

而日常生活的豐富肌理與內容是對於研究

>>

文化慣習在缺少國家高壓的介入下如何抵抗和超越制度化的種族及文化類別的試金石。在宗教領域，這種邊界的協商已經被透過過程，像是綜攝(syncretism)、混合和便型、組合和搭配等而被理解。印度教和道教在信仰、實踐、空間、儀式等場域已經混合了。寺廟或許可以很簡單去被辨認成道教或是印度教，但是道教家庭可能包括了奎師那、鳩摩羅、象頭神，耶穌基督、聖母瑪利亞、觀音、如來佛等這種神明。這樣的組合與搭配顯示了信仰主動地選擇了不同的宗教去進行實踐。馬來穆斯林族群和華人可能都回從雙方的精神信仰領域尋求精神生活的指引。

相似地，代表性的族群食物－喇沙(laksa)，雞飯(chicken rice)，囉喏(rojak)，馬來炒麵(mee goreng)和其他食物，都呈現了烹飪料理的借用和混搭，雖然特定食物通常被官方「誤認」是不同CMIO種族的代表。

在語言的領域，每日使用新加坡腔英語的有機浮現打破了簡化的CMIO種族分類和語言。作為口語的英文克里奧，以及融合了華人方言、馬來語、泰米耳語等地方方言的語言，國家對於新加坡腔英語的曖昧在「講好英語」的官方運動中可以清楚看到。

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已經研究了那些在不同界面下浮現的互動、相遇、經驗的。這些事物是在日常生的宗教、食物、語言、感知、電影、遊戲中形塑而成的。這樣的文化慣習打破了本質論的和相互排斥的界線，這些界線是被官方的種族分類所劃定的。和種族問題的批判性互動、CMIO多元文化主義，由權力宰制而來的特權等，這些反映了想像新加坡並超越國家中心論述的挪用的可能。

今天，新加坡面對的是日益增多的移民湧入，加上在日益不平等的世界裡面對都會的認同和新的期待。與其追求烏托邦的種族和諧，或是去打破種族分類架構，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應該鼓勵新加坡社會裡的不同團體去進行真

誠反身的自我批判和認識到種族、差異、多元文化等的處境、限制、以及替代想像。透過這些努力，個體和群體或許會被鼓舞去思考、辯論、想像、建構有意義的新加坡認同，而這認同可以不同，並且可以被分享。這個視野需要把認識和行動，尊敬和質疑，共識和鬥爭結合起來，去形塑一個更批判、創意、多元文化的公民。■

來信寄給Noorman Abdullah

<socnoorm@nus.edu.sg>

> 精英統治過後

Youyenn Teo,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新加坡



當代新加坡越來越常見這種「特別加強」和「小班教學」的廣告，Youyenn Teo攝影。

走進新加坡的任何一家購物賣場，你都會看到「特別加強」(enrichment)和「小班教學」(tuition)的中心，打著幫助小孩「在學校和人生可以成功」的廣告，或是訓練小孩知道「學習如何學習的藝術」，有些則教著和學校一樣的東西——英語、華語、數學、科學、物理、經濟——而還有其它更才藝的課程像是西洋棋和機器人。不論是學業與否，它們的目標都是讓小孩可以「準備好升學考試了」。

這些中心的林立反映了新加坡教育體系的核心特質，也反映了社會階層化的年輕化，早到甚至三歲就開始了。規律的階層化給小孩不斷的課業壓力，所以這些補習班鎖定了所有年齡層的小孩。學校倚賴的是標準化測驗，所以所有的活動都是為了考試而準備。最後，因為很重要且競爭激烈，補習中心不是給失敗的人，而是給想要往上爬的人。所以新加坡的額

外課業教育被認為是邁向成功的必要手段。

新加坡最常見的對於精英統治的批判是批評這個系統不按照應該的運作方式而運作。家長埋怨太多考試和作業。批評者則關心低社經階級的小孩也該有相同的機會。但是很少人批評課外才藝活動的訓練是有問題的。

在社會學的文獻中，精英統治被普遍認為是一種論功獎賞和勝者為王的系統。這有賴於狹窄的於什麼是值得獎賞和什麼不是的概念，並且這在 Bourdieu 所謂的「誤識」存在下特別可行——公眾相信系統是以某些原則運作的，但實際上則否。這個案例而言，新加坡體系獎勵由父母繼承而來的經濟和文化資本，而非僅僅獎勵辛勤工作。有這個階層化的真正原則和機制之後，成功者會被正當化，被看成是努力工作和聰明的人，而不是因為他們繼承了某些資源。精英統治也講述一種特定的失敗故事，那是因為個人的原因導致，不是結構性的不平等。

社會學來說，新加坡的教育體系是被設計好的。除了推動狹小範圍的特質和把學生分類以外，公眾誠心認為那些被獎勵的特質是個人能力和努力的反映。那些有著很好學歷認證的人，一路從好的途徑晉升上去，有正式的認可，有安全的專業工作、學術業、民間行業、公職人員，被認為應得好的地位和薪水。這個門檻很高，有時太高了，但是回報不被認為是武斷的。

批判的社會學觀點在看待教育和精英政體的時候，很難獲得共鳴。要了解為什麼，首先我們必須研究新加坡社會的兩個特徵：個人主義的制度化和科技論述的重要性。

支持著精英統治的邏輯是被編織進日常生活之中的，並透過多重的國家制度和複雜的政策，形塑各種選項，影響了婚姻、養育小孩、家庭管理、養老和照顧病人的各種路徑。這個邏輯是這樣的：個人必須照顧好自己和自己的家庭。而雖然新加坡國家介入了生活個各個領域，但是卻反對普遍的福利措施。個人的技能和認證取得、繼續就業、異性戀伴侶等都是取得公共才和福利的前提，這些資源包括了住房、健保、小孩照顧等等，若無法取得那些前提條件——學歷、工作、婚姻、後代(形成循環)——意味著沒有安圈、福利、社會身份。取得個人

>>>

的「成績表現」因此是取得上述資源的重要前提，而且核心家庭是基本的社會經濟與政策制定的單位—伴隨著跨世代的相互依賴。因此，家庭的投資對於取得良好成績是可以理解、甚至必要的。

第二，精英統治是被強力的民族和特定自我的科技論述所支持的。新加坡的精英政體是和馬來西亞討好與歧視特種族的體制不同的。精英統治—理性、系統、無關個人的一—已經被讚為是新加坡令人印象深刻的經濟成功、奇蹟的國家生存的根源。這個國家進步的論述可以在那些「造就」這個進步的人士的傳記裡面看見。像是Pierre Bourdieu的法國，「國家精英」—那些被世界頂尖大學認證的「該被讚揚」的人—就佔據特定說話且人們會聽到的位置。從政治精英和政策制定者的辦公室，記者和大學教授的桌上，這些人從有限且特定的角度看整個系統：這個系統雖然不完美，但是可行，因為他們都是精英。那些魯蛇的失敗故事是被消音的，孤立的，臣服的。精英是個好體系，因為那些反對的人沒有佔據有力的發言位置和沒有資源去批評之。

精英統治的代價是很高的。低薪的家長、那些不能給小孩良好資源的人，就得負起較高的代價去取得物質或是象徵的資源（稀少性）。而社會的不平等惡化後，收入高的人也可能要付出代價，會去害怕即使一點點的向下流動也可能意謂著很大的損失。而大量昂貴的教育產業、年輕人的憂鬱和焦慮、家長的壓力、叮嚀小孩寫功課浪費、不平等的惡化等等，這些都是代價。

社會學家可以做什麼？我們需要研究計畫和行動綱領。

就研究來說，我越來越可以確定的是教育社會學是不能和家庭研究、福利、國家社會關係、政治等分開來看的。為了理解精英寡頭統治，我們必須用上所有的研究工具去研究，包括了深深理解為什麼從一方面來說是個非理性的行為（如私領域的昂貴教育投資）可以幫助理解其他領域的問題（像是家庭主義式的反福利政治）。我必區去處理這些問題，並且不能簡單的從教育的觀點來看，還要看平等以及牽連的再生產各個面向。

此外，若社會學的工具可以去在公共關於精英統治的對話中得到支持的話，我們還要去

斷裂主導的言論。解構那些主導性的論述需要自我反身性作為前提。學者必須要有意願去超出思索精英統治和不平等作為僅僅是研究主題的方式，還要去檢視自身的特權和我們讓不平等得以持續的各種論述和日常生活實做。斷裂主導論述也需要和學院之外的觀眾對話，作為一個學科，若我們已經有了解特權和不平等再生產的批判工具，那我們就必須要在傳播這些想法到象牙塔之外這點上做得更好。這可以透過寫作、演講、討論，也透過和公民社會、教育者、政策制定者、家長的互動而得以可能。

來信寄給 Youyenn Teo
<yyteo@ntu.edu.sg>

> 世俗主義過後

Francis Khék Gee Lim,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新加坡



在一個公共住宅內的家庭寺廟的信眾，Francis Lim攝影。

在許多方面，作為一個新加坡人意謂著，不論公私領域，必須持續不斷地和國家所強加的社會分類系統進行協商。當然，所有的現代國家都試圖去定義、限制、管理不同的社會文化群體，這畢竟是國家建造和治理的基本工具。新加坡人持續不斷地要去對三個標籤進行協商：種族、語言、宗教，他們是國家神話的基本論述主題，也是國家試圖去進行社會和政治控制的基本治理工具。

當每個學生重複每日的「不論語言、種族、宗教」都去「效忠」一個統一的民族的時候；當每個公民必須在身份正上註明他們的「種族」時候；當弱勢族群權利和宗教和諧維護法案(1991)成為新加坡多元文化的基石的時候；當基督徒被因為太過於熱衷要人改宗而被入罪的時候；當一些「自我激進化」的穆斯林必須按照國際安全法而因為有恐怖攻擊的計畫被拘留的時候；這些時候我們都可以很容易看到新加坡的種族、語言、宗教深深的綁在一起並且政治上相當有爭議性。

對於新加坡政府來說，世俗主義被認為是這個國家多元宗教和族群可以和平共存的基礎。任何關於新加坡宗教與族群的社會學研究必須首先認識到新加坡是一個多宗教的社會、政府是個世俗政權的這樣一個事實。新加坡的宗教多元很大程度上是偶然的歷史結果，包括了之前是一個重要的貿易殖民地而吸引了許多亞洲和之外的人前來。而世俗國家的推動是從國家有意識地進行意識形態工作而開始的，這也受限於當時新加坡從馬來西亞聯邦獨立出來

的時候的環境，此外也由於政治領袖想要形塑一個民族國家認同，這個認同必須和鄰近的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的伊斯蘭文化有所區隔。

對於一個世俗國家來說，很令人驚訝的是新加坡有個穆斯林文化政府部門。在2016年的古爾邦節的時候，該部門部長警告新加坡人要拒絕有害融合的想法，並且提醒說宗教場合是個很好的時機去思考宗教和族群融合的議題。國家的公共政治論述中，伊斯蘭總是被描述成他者，這個他者是對於新加坡作為一個世俗政權、也對連結到極端主義意識型態對於社會和諧可能的威脅來說，都是如此。

新加坡的強國加把人們分類排放到不同「種族」裡面，而這個種族是透過文化差異，像是語言和宗教而決定的，所以關於族群和宗教的社會學研究通常採取兩個取徑。第一個是比較實證社會學的傳統，把「種族」和「宗教」看成獨立變相。第二個取徑則批判地檢視權力如何形塑了這些邊界，探討族群和宗教的劃界如何可能位移和模糊，導致曖昧、混合、多重的認同，並且完全不同於那些整齊劃一的分類架構。因此，關於宗教多元的新加坡研究發現許多印度教和道教的信仰者（分別從「印度」和「華人」社群而來）崇拜的神，包括曼尼瓦拉(Muneeswaran)，福德正神，保生大帝，哈奴曼(Hanuman)等，都是從兩個宗教傳統來的，有的神明甚至都被供奉在同一個寺廟中。

對於世俗主義的批判研究指出了世俗主義可以幫助正當化新加坡的多種族文化，有助追求社會祥和，但是也強調了世俗主義對於政策

>>

制定中的「客觀」和「理性」討論的影響。新加坡的世俗主義不是反宗教的、軍事的那種共產式世俗主義。反之，其承認了宗教對於人民生活的重要性，並且對所有的宗教平等，和憲法保障的宗教自由不同的是，新加坡政府鼓勵各式宗教群體去貢獻社會，特別是社會福利和道德與文化價值的推動。

新加坡世俗主義包括了兩個基礎面向。第一，國家政府堅持政教分離，禁止宗教群體進行政治動員。第二，政府控制和管理宗教，並透過設立代表作為宗教組織的「顧問」，提供諮詢給宗教團體，像是新加坡伊斯蘭委員會，以及寺廟、清真寺、或是信仰團體。這些顧問作為監督者，形塑宗教論述以符合國家的政策。

就像許多現代國家一樣，新加坡法律上是認證讓人們進行宗教崇拜的地點的，並且佈署由發展意識型態和現代化所構成的領土性之功能概念。作為一個城市國家，面對著土地稀少的問題，政府擁抱了高度的功效主義和介入性的都市計畫，當新加坡土地部從宗教團體取得土地之後，宗教團體會被迫離開，關閉。例如，若有華人寺廟被買起來去成立「結合寺廟」，不同供桌就會被放在同一個寺廟內。最近政府也提出要蓋多層樓房去容納不同的宗教活動。

許多宗教學者已經開始檢視國家對於管理和管制宗教的策略，但是比較少研究宗教如何去規避相關政策。例如，Terence Chong, Daniel Goh 和 Mathew Mathews 研究福音教會如何細緻地形塑政策和政治論述，並透過選擇政治領袖去表達對於政府的性與家庭的保守政策之支持。研究印度教的學者，包括 Vineeta Sinha 對於曼尼瓦的研究，指出了森林裡的儀式是為了不被政府監控。我自己的研究是看一貫道（華人而來的跨國「救贖宗教」）把公共住宅（官方的「世俗」地點）變成寺廟。同樣地，基督宗教也會在家組織了「小群體」聚會，而華人精

神媒介或是道教也會形成「住宅寺廟」。

這些案例指出了新加坡政府對於宗教的管理的可能限制，這是由於世俗主義對於「公」和「私」的宗教領域之區別。這個區別可能開啟了對於國家管制宗教之能力限制，也開啟了宗教群體去在政府限制之外運作的空間。■

來信寄給 Francis Khek Gee Lim
<fkglim@ntu.edu.sg>

> 全球化過後

Daniel P.S. Goh,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新加坡



濱海灣的國家的國慶遊行彩排，有個漂浮的舞台，Daniel Goh攝影。

有兩個故事告訴了我們關於新加坡的國立博物館和歷史教科書。第一個故事是關於自從1965年的獨立於英國的東印度公司Stamford Raffles從1819年起在這個島上的殖民。這個故事中，Raffles是個天才，發現了新加坡的地理戰略地位，因為位於馬來半島的下緣，就在印度洋和東亞的交會。英國的開墾有著很好的治理和開放的移民，所以屯墾從最一開始的小漁村擴大到今天的國際都會。第二個故事是比較最近的，就是關於最早的屯墾區Temasek。以亞洲探險家的考古的根據來說，Temasek是個堡壘城市，也是一個國際的交易港口，在14世紀被三佛齊帝國的王子所建立。後來則被馬六甲蘇丹王朝於15世紀控制，之後落入葡萄牙人手朱，然後城市就被廢棄了，回到了原本的梵語名稱：新加坡(Singapura)。

兩個故事的共同結尾是人民行動黨，該黨是自從1959年的執政黨，當時的英國殖民者建立了選權和自治政府，也奠定了後來成功的基調。而共同的情節則是全球化不但是新加坡成功的基礎，還是生存的依靠。全球化就是新加坡。因此，雖然新加坡1965年建立了一個想像的共同體——在非自願地脫離馬來西亞之後——執政黨的S. Rajaratnam (對於這個新國家的建立是個關鍵人物)在1972年把新加坡稱為一個全球城市。這個說法廣被認為相當有遠見，並且新加坡的確從一個商業都市轉變成工業經濟體，後來又成為了後工業城市，是亞洲的重要財金樞

紐。

但是Rajaratnam的洞見不是一個受期待的關於新加坡如何在政治經濟的需求下成為全球城市的論述。他利用了Arnold Toynbee的想法，做出了一個後黑格爾啟蒙的論點，說新加坡是一個全球城市。而新加坡必須成為且發展成全球城市，好讓這個論述實現，達成歷史目標。因此，在經濟上吸引跨國公司、在移民上保持開放，這不僅是務實的經濟生存之道，也是讓新加坡持續成為全球城市的基礎。

國立新加坡大學(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的社會系成立於1965年，是現代化努力的一環。過去50年，特別是早期，該系人類學和社會學家多數在西方最好的學校受過訓練，並且都參與了政府的社會政策制定。這包括了幫助多數人到公共住宅，管理族群和宗教多元主義，應對婚姻和生育議題，以其其它政府的社會工程和現代化工程所出現的問題。

今天的批判學者或許把這個看成是社會學家與執政黨共謀去打造一個霸權意識型態。但這是太過於簡便的後見之明論調。獨立後的年代，任何的新加坡人或是對後殖民新社會有同情心的人都會支持執政黨的意識形態，特別是這個是被Rajaratnam這樣的思想家所深刻提出的。況且當時是缺乏另外的替代論述的，沒有替代論述去說新加坡如何晉身國際社會，並且這是在去殖民時左派失敗之後，是在選擇性的採納社會主義政策之後，並且這是在被執政黨拿走了可以連結共產國際的元素的之後。

1990年代新加坡社會學有了重大的變化。轉捩點是1995年Chua Beng Huat的書《Communitarian Ideology and Democracy in Singapore》的出版。他把執政黨的意識形態拆解了，並命名之。後來Chua又出版了研究公共住宅的書(1997)，其論證超過新加坡五分之四的人所居住的公共住宅是新加坡社群主義的物質化基礎，這把所有人都整合到執政黨所打造的經濟體裡面。這不是一種專制意識型態，而是若從葛蘭西的理論來看，是一種日常生活對人民產生極大影響的霸權。新加坡的新生代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為了回應這個理論，便視圖去找出替代的論述和研究的方式。本期前四篇文章種指出了這點。

重要的是，這樣新加坡社會學的轉變是發生在Rajaratnam的全球城市變成了Saskia Sassen

的筆下的全球城市。而政府也擁抱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重塑經濟，加速資本積累、商品、遷徙的速度。新的詞彙出現了以連接詞「與」形式而成的二分法。市民被要求要「國際化」和「中心地人民」(heartlander)，去自信地在世界各地旅行但是又舒服地以地方的公共住宅為家。整個國家是一個民族且是一個全球城市，不再是這個民族是個全球城市。而這樣的多元也被快速的移民、多族群、多元文化所加速了。1989年，南亞研究院(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出版了一本指標性的書：《Management of Success: The Moulding of Modern Singapore》，這是由兩位地理學家主編，包含了許多第一代的新加坡社會科學家的文章，回顧新加坡的成功資本主義和亞洲四小龍的地位。2010年，該院出版了《Management of Success: Singapore Revisited》，是由社會學家Terence Chong主編，這本書試圖去理解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所帶來的緊張關係。

若全球化就是新加坡，那是全球化後的新加坡社會學會是什麼？有三種可能：去烏托邦，烏托邦，啟示。後見之明來說，我在2010出版的《Management of Success》一書中有一篇文章，就是一種去烏托邦的取徑。該文檢視了政府如何嘗試把新的多元族群文化融入舊的多元主義之中，為的是去管理由移民帶來的新的多元性以及解決經濟不平等造成的族群緊張關係，並且在政治上仍然掌握大權。這個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緊張則進入了現代化的矛盾之中，沒有辦法消解，唯有靠強大政府去管理。這是個涂爾幹的架構，問題從多元社會的情感連帶開始，並以只有仰賴政府去整合社會與管制這樣的悲觀論調做結尾。而延伸的意思就是說，尋找代替的實踐與論述是有用的，因為國家必須更新其道德的保護責任，並透過採取這些替代的實踐和論述整合到文化中才得以可能。

第二個可能性是烏托邦的，這出現在這期的文章裡面。這個取徑喚出Thomas More的烏托邦式的追尋，追尋社會、政治、宗教的理想共和傳統，建立在一個有著完美人口的島嶼上，並有著民主與平等。這樣的強調是最小程度上倚賴政府的，並希望留給個人自由和成就的空間。人們會是經濟上有創意，社會上善良，政治上參與的。對某些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來說，對這些新加坡的希望空間的發現和分析，雖然有時必須透過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但是是足夠的。這裡的信念是這樣的故事會啟發大學生，以及一般民眾和傑出的人，去行動，去改變生活世界。但是對於其他人來說，就像Youyenn Teo本期文章裡所指出的一樣，他們會要求去讓學術的行動主義把這樣的故事帶給更廣泛的群眾，社會學則因此變成改變的催化

劑。

重要的是，烏托邦的取徑雖然會被執政精英出自忌妒這樣的意識情態影響力而反對之，在政治上既非反對也不激進。這個取徑是和Rajaratnam全球城市一樣的，因為他在1972年的演講中說要「讓我們的人民有智識和精神上的能力去建立一個全球城市，變成一個先知夢寐以求的天堂國度」(The Straits Times, 1972年2月7日)。總之這個取徑可以追溯到聖奧古斯丁。

最後一個可能是啟示的取徑。這在政治上是很難維繫的，因為新加坡的政治向來保守。但是在知識上，以及在政治上是必要去思考這個取徑所提出的問題的。若是全球化就是新加坡，那全球化反轉之後將會發生什麼事情？這個在1920和1930年代已經出現過，也是這個時候英屬馬來亞的左派和族群民族主義者為二戰後的去殖民時代的激烈暴力鬥爭奠定了基調。結果暴力衝突產生了三個政治實體，這是之前完全沒有預料到的：馬來亞聯邦，馬來西亞聯邦，新加坡共和國。這些實體轉變了當地社會，且出乎意料之外。什麼樣的未來是今天無法想像的呢？若預料之外的事情發生了，新加坡社會何去何從？當全球化退潮，新加坡又會變成什麼樣子呢？■

來信寄給Daniel PS Goh
<dsong@nus.edu.sg>

> 不自由的未來

反對性別主義和反全球化

Agnieszka Graff, University of Warsaw, 波蘭 · Elżbieta Korolczuk, Södertörn University, 瑞典, ISA女性與社會(RC32)和社會階級與社會運動(RC47)委員會成員



反同性戀的海報，2015年8月30日。Elżbieta Korolczuk攝影。

全球政治裡，性別是重要的。在美國總統大選過後，我們對於這點是再清楚不過了：川普的大男人沙文偏見可以受到廣大的支持，這只不過是問題的一部分而已。在美國或任何其他地方的民粹主義不僅僅是訴求不穩定與害怕，也訴諸於性別關係、(異性戀)性傾向、生殖而來的焦慮，在每個國家裡，

保守人士所批判的「性別」或「性別主義」，包括性別平等政策，性教育，LGBTQ及生育權利，這些都幫助動員了許多女性和男性，讓民粹政治領袖得以抬頭。雖然對於女性主義和性別平等政策的反對不是新鮮事，但是現在的浪潮標誌了一個從之前新自由主義典範而來的不一樣的典範：社會保守主義。社會保守主義現在很明

顯連結到了對於全球資本的反對。

波蘭 2015 年右翼民粹政黨法律與正義黨的大選勝利是前所未見的，並且居然在保守媒體和宗教論述中訴求反對「性別主義」。從 2012 年開始，波蘭的天主教會和保守團體已經開始採取了許多行動，反對在政策制定中使用「性別」的字眼，反對性別平等的教育和立法（像是簽署伊斯坦堡會議對於防治加諸於女性的暴力的公約），並且試圖去限制性權和生育權利。這些行動包括了天主教會的領導，保守政客，右翼智庫，反墮胎團體。其他團體也加入了，例如，一個家長的草根團體「拯救下一代的小孩！」（Ratujmy Maluchy!）從一個 2009 年反對教育改革的戰場中出現，加入了反對伊斯坦堡公約的戰役，認為會危害到父母的權威，特別擔心小孩會受到那些「同性遊說團體」的威脅。那些反性別主義的人士宣稱要保護小孩和家庭，還有波蘭的宗教和文化價值，反對女性主義和同志團體與人權團體，認為那是被自由派貪腐政客所支持的。在那些反性別主義的論述裡面，當時的政黨「保守自由公民黨」被描述成是極左派，也被認為要結合外國勢力如歐盟摧毀波蘭民族和傳統價值。

在這些保守的公集中，「性別」並不是一個用來討論性差異和分析男性或女性氣質之建構的標籤。相反的，性別是一個國際主義的陰謀，從性革命開始，用一種共產主義式的方式強迫人們接受。聯合國或國際跨國資本是支持這個陰謀的代表，而且性別主義者要推動

墮胎，讓道德墮落，推動自由主義，摧毀社群和傳統家庭。而且運動的目的是強加武斷的性別改變給那些小朋友。總之，「性別」這個概念持續和性差異的取消有關，並且造成性傾向的混亂，讓世界一些地方人口減少。

反性別主義運動不只是在波蘭發生而已。類似的論述可以在世界各地找到。在俄國，宣稱同性戀和性別平等運動是威脅在地傳統價值的論述讓普丁的支持度更加強了。法國的反同志婚姻則讓右翼的民族陣線支持度上升。美國，川普的沙文主義並沒有阻礙了其總統路，選民也並沒有被選出第一位女性總統的訴求而打動（53% 的白人女性投給川普）。所以，連結右翼民粹和反性別主義的東西是什麼？兩個意識形態的交會不只是在社會保守價值的維護而已，也對準了自由派的精英，要他們對社會和經濟的問題負責。

我們發展出了一套分析，這是透過許多合作的計畫去看歐洲的反性別主義運動以及運動者的經驗。我們分析了許多文本：重要反性別運動人士的書籍、文章。我們也訪問和看公開的聲明（包括了兩位教宗、在地的天主教領袖、知識分子），媒體報導，反性別主義事件，其網站發表的各種文件（波蘭的 www.stopgender.pl、國際的 www.citizengo.org 或是 www.lifesitenews.com）

所有的反性別主義的文本都指出了來自自由派精英、女性主義者的危險性。而這些反對者則聲稱代表了一般人民，辛勤工作，愛護家庭。重要的是，一種潛在的受害者認同是混合了經濟

和文化的元素的：性別主義者被認為是有錢且和全球精英連結的；而一般人民則是受到全球化的危害。這個文化和經濟的交織連結可以在反性別主義的論述中清楚看見：使用保守版本的反殖民論調。性別主義被認為是外國的加諸，是殖民，被用來和威權與恐怖主義做比較。這個論述其實和對於西方殖民主義的辯論是脫勾的，但是，這卻一直被用在沒有被殖民的國家，像是波蘭。在所有的民粹論述中是反對腐敗的國際精英，因為他們剝削一般人民還有民族，讓他們暴露危險之中。

這個反性別主義的一個例子是當時波蘭的司法部長 Jarosław Gowin。他在 2012 年大力反對伊斯坦堡大會共識，說是「性別主義的載體」，是一個意識形態的特洛伊木馬，為的是要讓在地價值和傳統家庭消失。同樣地，2016 年 1 月，教宗警告說「性別意識形態」是危險的西方富裕國家的價值，外國援助和教育都推動性別平等政策，但是「善良茁壯的家庭」可以抵擋這些威脅。

在他們對於「性別主義」的描述中，右翼基本教義派把意識型態殖民和經濟權力連結了，他們被看成是國際的企業和機構的陰謀。波蘭的許多保守派把矛頭指向歐盟，其他的國際組織也成為箭靶，像是全球對抗愛滋、結核病、瘧疾基金會、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銀行。波蘭的脈絡中，反性別主義也對準了公民社會中的機構，像是被西方所資助的團體，如 LGBTQ 權利團體、反恐同陣線 (KPH) 等。這些組織被看成是跨國腐敗精英

的同路人。像是一位主要的反性別主義者 Gabrielle Kuby 在一篇訪談中所說的：

這個全球性別革命是由全球的權力精英所執行，包括了全球組織像是聯合國、歐盟，以及全球大企業，像是亞馬遜、谷歌、微軟。大基金會像是洛克斐勒和古根漢等。富豪像是比爾蓋茲、泰德透納、喬治索羅斯、華倫巴非特等。非政府組織像是國際 Planned Parenthood Federation 和國際 Lesbian and Gay Association。

儘管對於「在地」和「代表性」的價值的強調，反性別主義的運動也被跨國的網絡像是世界家庭大會 (World Congress of Families) 和 CitizenGO 等支持。例如，波蘭的 Ordo Iuris 和歐洲青年聯盟 (World Youth Alliance Europe)、美國天主主教家庭人權協會、布魯塞爾的歐洲尊嚴監督組織密、英國保護未出生孩童協會等密切合作，儘管這些跨國連結的存在，反性別主義人士還是用反全球化的語言，強調人的尊嚴，強調家庭價值和保護兒童，這些都成功地喚起人

們的焦慮情感。

保守人士已經開始去鞏固那些對於新自由主義和政策所造成的經濟不穩定和焦慮感了，這些焦慮被引導到反對精英或是在波蘭被描述成背德的「歐洲憤青」(一個極右派的口號是：「戀童癖：看看這些歐洲憤青」) 的憤怒，或是在美國的「腐敗希拉蕊」。新的反性別主義的浪潮建立再反對性別平等政策，這可追溯到 70 年代，但這也反應了跨國對於非自由的民粹和民族主義的抬頭。其把性別主義和個人主義以及文化與經濟剝削劃上等號，這個策略開啟了非自由民粹的成功道路。反性別主義已經變成新的保守語言，用來反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

來信寄給 Elzbieta Korolczuk
<bekorol@gmail.com>
和 Agnieszka Graff
<abgraff@go2.pl>

> 在波蘭捍衛 生育權

Julia Kubisa, University of Warsaw, 波蘭



波蘭女性在Warsaw抗議新的墮胎法案。2016年10月3日，Elzbieta Korolczuk攝影。

在2016年的秋天，有一波女性的抗議爆發了，目的為了反對接下來可能要把墮胎入罪化的行動。波蘭女性主義從1993年就開始抵抗反墮胎法案，而波蘭的法律是歐盟裡面最嚴格的，只讓亂倫、強暴、危害健康性命、胚胎基因變異的案例下可以墮胎。

而波蘭的社運者已經指出，這種法律限制已經導致了地下的墮胎，但是這個議題要直到2016年才被廣泛矚目。在波蘭的2015年國會選舉之後，右翼的法律和正義黨成為多數，所以限制墮胎的立法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在2016年的時候，政府領導者，包括首相 Beata Szydło 在內，釋放出訊息說要支持完全禁止墮胎，而且極保守的 NGO 團體 Ordo Iuris 則開始連署要推動立法把墮胎的女性和醫生送入大牢，並要政府確定那些流產案例不是被墮胎藥物所引發的。

而 Ordo Iuris 所引起的憤怒迅速的導致兩個社運的產生，這些示威抗議，主要由一個草根的女性主義團體 Girls for Girls 和立法遊說團體 Save the Women 所發起，她們主要是社會民主女性主義者，為的是解放波蘭的反墮胎法。

在2016年中，Ordo Iuris 宣佈已經收集到了超過50萬的簽名，而 Save the Women 則收集了25萬。兩者的請願都被送到國會，右翼天主教組織已經送過好幾次類似的請願了，但是支持墮胎的請願在90年代之後這次是第一次，因為90年代的時候有一個120萬的簽名請願被拒絕了。

這次國會又馬上拒絕了 Save the Women 的草案，但卻繼續討論墮胎入罪化的提案。這個作法讓 Save the Women 和左翼 Razem 黨相當氣憤，上街抗議。他們要求支持者身穿黑衣加入示威，或是自拍把照片放上網路，也用 #black-

>>

protest 當作標籤。當波蘭最受尊敬的女演員建議一場全波蘭女性的罷工，這是仿效 1975 年的冰島女性罷工，社群媒體上的運動者馬上跟進，宣佈 10 月 3 號是全波蘭女性的黑色罷工日，雖然這場運動不是由女權團體所發起，但是許多的相關人士和政治人物都響應，捐贈物資等。在罷工之前，許多女性告訴上司要休假一天，為的是響應這個罷工。許多大學也停課。

儘管有各種阻礙，像是罷工的法律地位等，這次還是很成功的，因為動員能量可說前所未有。不像其他城市或首都的示威抗議，這次女性罷工是不分城鎮的受到支持。女性和女孩，以及一些男性在全國 142 個城鎮鄉村組織動員，超過了 15 萬人，全部都穿黑衣。口號都是關於女性的基本權利，生育權，女性尊嚴，這些都和禁止墮胎牴觸。因為罷工那天下很大的雨，許多人撐傘，所以也變成了抗議的象徵。

罷工的規模和能量讓執政黨以及天主教會非常驚訝。但他們的第一個回應是充滿性別歧視的：天主教宣稱女性被強暴不會懷孕，一個民粹政客說女性性伴侶很多，要被控制，而外交部長則稱女性完全不負責任。然而，抗議三天之後，國會否決了完全禁止墮胎的提案，這是執政黨的少數失敗。

政府放棄了對抗的修辭，反而採用「軟性」的方式，像是總理宣佈波蘭女性若經歷「困難懷孕」-- 困難指的是無法治癒的疾病或是胚胎有問題—可以得到一次性的 1000 歐元，這是為了給那個出生即將夭折的嬰兒的補償。這個法案已經被介紹給大眾了，但是反對者認為這是物化女性。

許多參加全波蘭女性黑色大罷工的社運者決定繼續奮戰，所以政府會持續受到壓力。兩周之後，她們組織了另外的罷工，規模較小，但是制定出了十一點行動綱領，推動女性尊嚴和自由，反對對女性的侵害、家暴、社會軍事化，並要求以女性為出發點的社會政策。而黑色大罷工也啟發了至少兩位名人在公開場合談論自己的墮胎經驗，打破的禁忌。大眾有 58% 支持黑色女性大罷工，可說相當有群眾基礎。這次罷工也得到了廣泛的國際矚目，像是啟發了阿根廷、冰島、南韓等國的女性去組織類似的抗議。Save the Women 的 Barbara Nowacka 和

Razem 的 Agnieszka Dziemianowicz-Bąk 獲獎為 2016 年的全球思想家，這個獎是由 Foreign Policy 雜誌所頒發的，其兩位代表了波蘭女性黑色大罷工運動。

波蘭政府已經繼續其軟性的說服工作，並且放棄提及墮胎的限制，反而用支持那些出生帶有先天殘疾的嬰兒的論述。但是政府並沒有實際上真的增加資金給這些案例補助。不過女權團體繼續反抗，最近，當衛生部長要降低生產和女性照顧的醫院的標準的時候，以及執政黨說要拒絕歐洲伊斯坦堡委員會所要討論的女性家暴議題的時候，女性團體說：「我們可是不會收起我們的雨傘的！」■

來信寄給 Julia Kubisa
<juliakubisa@gmail.com>

> ISA的青年社會學家網絡

Oleg Komlik, Ben-Gurion University, 以色列，ISA青年社會學家網絡會長



| Arbu繪。

ISA 青年社會學家網絡 (Junior Sociologists Network; 以下簡稱 JSN) 旨在把學生，年輕學者，相關科系學者等，不論興趣或方法取向，都連結起來。這篇文章我會簡介 JSN，說明這個特殊的國際社群如何推動其會員的專業發展，以及更廣泛的社會學作為志業。

從 2006 年開始，由於受到 ISA 會長們和執行委員會的鼓勵，JSN 從一開始的鼓勵 ISA 博士實驗室計畫的學生、ISA 青年社會學家競賽、以及各界世界大會的規模演變成今天的網絡。這個社群的成員都是在地紮根、全球連結的。這是一個很棒但是也充滿挑戰的嘗試。我們看到了潛力，所以想要實現這樣的理想。JSN 的目標是提供青年社會學一個分

享資訊、交換想法、開啟合作的一個平台，讓他們可以發展生涯，並且創造、傳佈、應用社會學的知識。

過去兩年半來，我們看到了 JSN 相當令人興奮的成長。我們努力把這個資訊傳播出去，特別是全球南方，所以 JSN 的會員已經有 2500 名碩士、博士候選人、青年、資深社會學家了。雖然多數是學術人員，但是也有運動者和非學術的相關人員加入。我們歡迎所有那些認為社會學是其工作一部分的人。

JSN 的活動主要是以四項為基礎。第一，[電子郵件名單](#)成為了受歡迎的資訊傳遞來源。每兩週 JSN 的通訊會提供有用、有趣、相關的消息，像是徵稿、博士後名額、獎助公

>>

告、徵才、以及激盪想法的文章。

第二，ISA 的博士論文摘要庫是一個開放的資料庫，讓青年社會學家可以放上自己的博士論文摘要、個人簡介、聯絡方式。現在已經有 650 份摘要了，透過幫助參與者發現主題，這個平台開啟了合作的機會。此外，出版社也會瀏覽這個資料庫，並且聯絡作者。

第三，JSN 有自己的[臉書頁面](#)以及[推特帳號](#)。上千名的跟隨者和造訪者可以透過張貼公告、博士論文摘要、有趣連結等去幫助傳遞資訊。

第四，JSN 很驕傲地保有了共同主辦斯洛文尼亞社會科學國際會議的傳統，也支持其他學術會議，把青年學者從世界各地聚集在一起。

我要謝謝 JSN 委員會的成員 Dolores Modic 和 Tamara B.

Valic 的投入，以及 ISA 的秘書的協助。我要利用這個機會說，JSN 永遠會聆聽建議，任何想法和幫忙都會相當珍惜的。

JSN 和 ISA 的其他重要計畫和研究委員會一起幫助建立一個社會學的全球社群，然後去解構社會政治的語言迷宮。在這個新自由主義和市場化以及威權和民族主義盛行的年代，我們記住了社會學作為志業的重要性。我希望可以去進一步傳遞這個珍貴的社會學的火炬。■

來信寄給 Oleg Komlik
<komlik@gmail.com>

> 翻譯《全球對話》 成印尼文

Kamanto Sunarto, University of Indonesia, Depok, 印尼

2015年4月一群印尼的社會學家組成了編輯團隊，著手翻譯《全球對話》的第5卷第3期。那是第一版的印尼文版本，共有16國語言，於2015年9月出版。

這個團隊包含了9為社會學家，分別在5所大學、4個城市：在Depok的印尼那學(University of Indonesia)，在Yogyakarta的加查馬達大學(Gadjah Mada University)和聖那塔達瑪大學(Sanata Dharma University)，在Bogor的波葛農業學院(Bogor Institute of Agriculture)，以及在Kupang的塔魯瑪迦大學(Nusa Cendana University)。另外還有4位成員是就讀於澳洲國立大學(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巴黎高等社科院(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阿姆斯特丹大學(University of Amsterdam)、萊頓大學(Leiden University)的博士候選人。

有3位成員組成了編輯委員會，負責審查翻譯稿。委員會成員也翻譯文章，特別是當其他翻譯者沒有時間的時候進行。同時，成員也審查其他的翻譯稿。此外，一位委員會擔任像是總編的職位，另外會有一位擔任通訊聯絡員，最後還有一位負責和《全球對話》的管理團隊接洽。一位大學生負責協助編輯、設計、製成印尼文版本。

在《全球對話》發行前一個月，編輯委員會會聯絡每一位翻譯者去翻譯1到2篇文章，取決於他們的時間。因為每個人所屬的學校距離很遠，從67到2770公里不等，所有的聯絡都以電子郵件或是社群媒體進行。

而印尼編輯團隊遇到的挑戰，其實和6.3期的羅馬尼亞團隊所遇到的是大同小異的(2016年9月)。除了基本的英文和印尼文的語言結構不同之外，許多基本的社會科學概念也沒有被正式翻譯，所以許多學者就以英文原文呈現。而

「許多基本的概念還沒有被翻譯。」

編輯委員為會查字典，查期刊，討論，甚至會諮詢專業人士或是原文作者。

在同儕審查所有的翻譯稿件之後，會開始聯絡每一位去解決問題，而委員會會去確認ISA的準則，然後確定一切無誤之後把最終稿件交給《全球對話》的主編。

在ISA把《全球對話》刊登在網路上之後，委員會會把連結寄給印尼社會學會(ISI)、印尼社會學研究計畫協會(APSSI)、各系所、圖書館、研究中心、社會學學生組織，以及各大學的社會學家。■

來信寄給 Kamanto Sunarto
<kamantos@yahoo.com>

> 介紹印尼編輯團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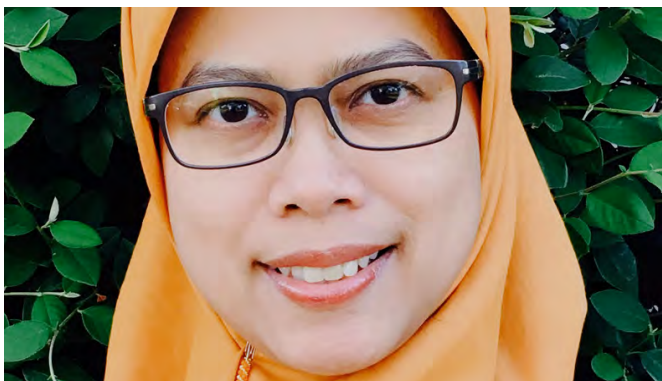
Kamanto Sunarto是印尼大學(University of Indonesia)的社會系、社會與政治科學系的退休教授。他1980年從芝加哥大學得到博士學位，現在的興趣是高等教育和社會學的歷史。他是ISA的教育社會學(RC04)和社會學歷史(RC08)研究委員會的成員。



Hari Nugroho目前是一位在荷蘭萊頓大學(Leiden University)文化人類學和發展社會學的博士生，以及在印尼大學社會學系的講師，社會政治學的教授。他獲得荷蘭的伊拉斯姆斯大學(Erasmus University)的社會研究院的碩士學位。他的研究興趣在勞工、社會運動、本地政策和社會不平等。Hari是ISA勞工運動(RC44)、社會階級和社會運動(RC47)，以及社會運動、集體行動和社會變遷(RC48)研究委員會的成員。



Lucia Ratih Kusumadewi 是法國巴黎的高等社科院(EHESS)的介入社會學分析中心(CADIS)的博士生。她2006年拿到EHESS博士先修生(DEA)學位，現在是印尼大學的社會與政治科學系和社會學系的講師。主要興趣是社會運動、認同、宗教、青年、教育。Lucia也是ISA宗教社會學(RC22)和社會階級與社會運動(RC47)研究委員會的成員。



Fina Itriati 是印尼Yogyakarta的加查馬達大學(Gadjah Mada University)宗教與文化研究所的講師，現在在澳洲國立大學(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的藝術和社科院讀博士。其研究計畫叫做「The Biosociality and Redefinition of Identity of Newly Disabled Women in Post-Earthquake Indonesia」，其使用民族誌方法去了解殘障女性經歷災難後的日常生活。她對性別、文化、社會、體現、殘障、災難、人權等議題。Fina也是印尼社會學社和ISA社會科學中的身體研究委員會(RC54)的成員。



Indera Ratna Irawati Pattinasarany 是印尼大學 (University of Indonesia) 社會系的講師，社會與政治科學系的教授。她的研究領域是社會階層與流動、社會不平等、貧窮與教育社會學。Indera 在印尼大學獲得社會學博士學位，以及在美國州立密西根大學獲得藝術碩士。她是 ISA 的教育社會學 (RC04) 和社會階層化 (RC28) 研究委員會的成員，同時也是印度社會學學會成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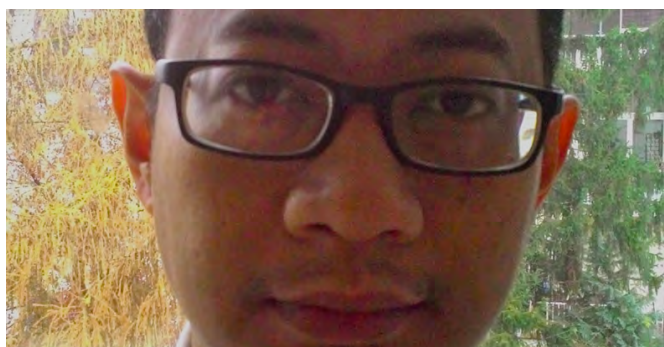
Benedictus Hari Juliawan 是印尼的聖那達瑪大學 (Sanata Dharma University at Yogyakarta) 宗教與文化研究所的講師。他也是一位在當地非營利組員 Sahabat Insan 工作的研究員，該 NGO 是研究移工議題。他在 2007 年完成哲學碩士，並且在 2011 年獲得英國牛津大學 (Oxford University) 研究發展的博士學位。他的主要研究興趣是在勞工運動、移工、認同政治及地下經濟。



Mohamad Shohibuddin 是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的社會系博士生。他也是印尼的葛農業學院 (Bogor Institute of Agriculture) 傳播和社群發展系的講師。他是薩九友 (Sajogyo) 學院的執行長，這是一個聚焦貧窮、鄉村發展、農業變化的機構。其研究興趣包括土地改革政策、鄉村研究、和平和衝突、鄉村社會運動。



Dominggus Elcid Li 是資源治理和社會變遷學院 (IRGSC) 的執行長和研究員。他 2014 年從英國的伯明罕大學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取得博士，並在美國 Boston 的哈佛甘迺迪學院做了博士後研究 (2014-2015)，現任東印尼 Kupang 的塔魯瑪迦大學 (Nusa Cendana University) 社會與政治系講師。其研究興趣是遷徙、人口販賣、民主參與、鄉村社會學。



Antonius Ario Seto Hardjana 於德國的法蘭克福的歌德大學的人類學獲得博士，在德國的帕紹大學 (University of Passau) 取得碩士，主修南亞研究，現在他是印尼大學社會系的講師以及社會與政治科學系的講師。其主要研究是文化研究、社群媒體、社會網絡。